

延安的「革命鴉片」： 毛澤東的秘密武器

• 陳永發

摘要：抗戰後期，中共曾經在陝甘寧地區大量種植、製造和輸出鴉片，以其所得進口邊區急需的棉布、棉紗和醫療器材，鴉片因而成為陝甘寧邊區財政的重要支柱。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試圖進一步回答三個問題：第一，中共的鴉片種植和販賣是在甚麼情況下成為其重要決策？第二，毛澤東跟鴉片決策及其落實有何直接關係？第三，作為陝北大生產運動模範的南泥灣，在軍團開墾荒山野地時曾否種植和販賣鴉片？中共以「革命」需要為種植和販賣鴉片提供辯護，故其鴉片可稱為「革命鴉片」；中共雖賴之以反制國民黨經濟封鎖，但鑒於它是不名譽的秘密武器，故諱莫如深迄今，本文則力圖揭開其神秘面紗。

關鍵詞：鴉片 經濟封鎖 毛澤東 延安 南泥灣

一 緒論

2016年《中國鄉村研究》海外版 (*Rur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刊出山西大學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岳謙厚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特貨貿易〉^①。光看題目，由於不知道「特貨」是甚麼，幾乎所有的讀者都不會特別注意，遑論產生閱讀興趣。如果因為好奇而進一步翻閱，就會很快發現這是一篇有關抗戰期間中共在晉綏根據地種植和販賣鴉片的論文。雖然該文重點在於突出中共厲行禁煙和取締各種私販，但是承認該根據地以統購統銷政策為名，實際縱容和鼓勵當地農民種植鴉片，由公家統一收購，再輸出境外，賺取法幣和金銀，用以購入所需戰略物資。

《中國鄉村研究》海外版是由荷蘭以出版漢學著作聞名的博睿學術出版社 (Brill)，與美國《近代中國》 (*Modern China*) 期刊創刊人兼前主編、原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黃宗智合作發行的電子期刊。令人詫異的是，在此

一知名期刊的中國大陸版上，卻看不到岳先生的大作。雖然聯想到歷史學者王汎森所說清初禁書的「權力毛細管現象」，讓我十分感慨，但還是非常高興，因為它證實了二十八年前一篇拙作的主要論點。我這篇拙作的題目是〈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②，文章根據告別毛澤東「不斷革命」後大量出版的《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史料摘編》等史料書籍指出，1941年「新四軍事件」爆發後，中共陝甘寧邊區的財政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僅依為支柱的外援，包括國民黨政府撥款、敵後抗日根據地協款和共產國際給款，頓時全部斷絕，而且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全面經濟封鎖，不能與境外互通有無。面臨如此嚴重的財經危機，中共動用軍隊大量種植、製造和輸出土特產。當時，陝甘寧邊區雖然走私食鹽、甘草和皮毛等土特產，以換取法幣外匯，但所得遠不敷走私進口棉布、棉紗、醫療器材，以及其他重要物資所需。鴉片種植、製造和販賣正可以彌補貿易嚴重逆差，並提供大量財政經費。據中共資料透露，抗戰後期中共中央有二成五到五成的財政收入，即來自此一走私生意。鴉片在中共財政上如此重要，作為邊區向國民黨區輸出的主要物資，豈容中共革命史研究者視而不見。

二十八年前撰寫拙文時，岳謙厚大作尚未發表，當然不可能拜讀。本人是所謂台灣學者，岳謙厚引用的一篇重要文獻，亦即1988年梁愛民在《延川文史資料》中發表的回憶文章，當時也無緣拜讀，所以不知道抗戰後期中共曾刻意以「特貨」、「土貨」、「土產」和「肥皂」等名目稱呼大煙土（簡稱「煙土」），也就是鴉片或罌粟。之所以特別提到梁愛民此一資料，乃是因為他是關鍵證人，證詞至關緊要。1940年代，他是中共陝北財政廳禁煙督察處專員，回憶光榮的革命歲月時，不僅承認未依中共公開法令將所沒收的鴉片悉數「銷毀」^③，反而開設公營商店，連同大批本地中共自產鴉片，招來外地商販，然後全部走私出境，以便換回金銀、法幣和物資^④。岳謙厚的研究發現，在有關晉綏根據地的財經史料文獻中，舉凡所謂「藥材」、「藥品」、「土布」、「新土產」、「洋煙」、「料麵」（比鴉片更純的毒品）、「料子」等名詞，均不能全照字面索解，因為所指經常就是鴉片。其實，岳謙厚遺漏了「特產」和「土特產」這兩個重要代稱。今天「革命聖地」延安南泥灣的土特產指小米和狗頭棗，當年則指食鹽、甘草和皮毛；不知有多少延安居民知道，當年在更多的時候其實特指和專指鴉片，而鴉片正是其時陝甘寧邊區向國民黨區走私物資中的最大宗。

1990年無緣閱讀梁愛民和岳謙厚的文章，當然不可能知道鴉片有那麼多的代稱，所以必須走冤枉路，就中共公布的文獻仔細考證。只有突破連串字障以後才赫然發現，1941年以來，中共從種植和走私鴉片獲得的利潤驚人：1942年佔全邊區中央「歲入」40%，1943年佔40.82%；1944年「解決財政開支」26.63%，1945年40.07%^⑤。二十八年前的研究也發現，1943年以後中共有把鴉片種植中心轉移到晉綏根據地的傾向，惟始終不理解何以產生此一地理變化，更不知此一地理變化和中共中央的政策有何關連。

撰寫〈紅太陽下的罌粟花〉一文時，我認為敵對方的資料很難排除造假污衊的可能，所以盡量不用；萬一引用，僅作為佐證而已。然而這樣一篇幾乎完全建立在中共出版的公開或半公開文獻基礎上的文章，發表以後始終未獲中國大陸史學界同行的公開回應：既無人證實，也無人駁斥。只知道有一位

著名的美國學者朋友到西安陝西檔案館看資料時，發現不准借閱的四類檔案中，赫然列有鴉片名目；而中國大陸近代史學界的朋友告訴我，同事母親當年曾在延安的小單位職司鴉片財務進出；另一位父親當過解放軍軍官的長江級歷史學者，則對我發掘出來的歷史事實頗有鄙視不屑的味道。他說，從小就聽父執輩閒談種植和販賣鴉片時的趣事，耳熟能詳。總之，私下不時有人告訴我，拙作主要論點大致不謬，可是就沒有人在中國大陸的公開出版物中承認或討論當年陝甘寧邊區大量種植和販賣鴉片的歷史。

及至2013年洪振快在《炎黃春秋》雜誌發表〈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一文，長期的沉默才終於被打破^⑥。洪振快當時擔任該刊執行主編，根據我無法看到的資料，討論了四個我沒注意到的課題：鴉片何以稱為「特貨」、南泥灣有無種植和販賣鴉片、黨政軍之間在鴉片販賣問題上有何矛盾，以及黨內有無反對鴉片種植和販賣的主張。洪振快當然也證實了拙文的一些主要論點。在此文刊布前後，透過「谷歌」(Google)搜尋網絡，也能搜到幾則有關抗戰時期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的帖文，其中以2014年3月「牆外樓」網站刊出的〈知乎：共產黨真的在南泥灣種過罌粟嗎？〉特別值得一讀^⑦。該文匿名作者意圖為有關中共與鴉片問題蓋棺論定，文中附上大批一手文獻影印圖像，證明中共在陝北曾經大量種植和輸出鴉片，也曾經在晉綏根據地做過同樣事情。不論中共中央在渡過財經難關之後是否在轄區下令全面結束種植和販賣鴉片，但毫無疑問，國共第二次內戰期間，販賣鴉片所得仍然是中共西北和東北某些地區的重要財源。

岳謙厚發表的論文並非研究抗戰時期的陝甘寧邊區，而是研究日本敵後的晉綏根據地。但文章證實中共確曾在陝甘寧邊區大量種植和販賣鴉片，而且依賴其收入打破了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養活大批幹部。因此，儘管他將我批評為蘇聯情報人員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的同路人，認為拙作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⑧，我仍然高興能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看到他以中文撰寫的論文。

本文即以前述幾位作者提出的新史料和新證據，就抗戰後期延安的鴉片問題再作進一步討論。之所以用「革命鴉片」一詞命題，是試圖突顯中共的鴉片種植和走私，雖然形式上無異於其他國家、政權或政治團體所作的同類事情，但是對中共領導人而言，是基於中國革命需要：不種植和販賣鴉片，中共的革命隊伍就不能維持，遑論繼續革命到底。以下主要分為三部分：首先強調「經濟戰」的觀念。過去研究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大多只注意軍事摩擦或衝突，罕見學者從經濟戰角度探討，故本文從延安財政需要角度來看國共鬥爭，強調熱戰以外，國共兩黨尚在進行經濟冷戰。其次關懷毛澤東在延安種植和出口鴉片的決策過程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我不否認中共在其轄區內執行嚴禁鴉片的政策有顯著成果，更不否認毛澤東動員軍隊和農民進行大生產運動對中共渡過財經難關發揮過重大作用，但是鴉片種植和販賣畢竟是中共成功反制國民黨經濟封鎖的關鍵，無論其決策過程多麼隱晦難明，萬萬不容不去試圖釐清。最後探討以軍隊墾荒著名的南泥灣，除大量種植糧食以外，是否同時種植鴉片？若有的話，為何1944年中外記者團在當地四處尋找，卻未發現罌粟花的蹤影？

二 國共鬥爭中的經濟戰

1935年底毛澤東率領殘餘紅軍約三千人抵達陝北時，蔣中正認為他們進入了兵書所謂的軍事絕地。這地區實在太窮，窮得不可能長時間供養太多的軍隊，他認為中共紅軍很快就會因為欠缺物資而自我崩潰^⑩。毛澤東基於同樣理由，在陝北落定腳跟後，要搶渡甘肅南部黃河的紅四方面軍停止北進會師，另行改組為西路軍，打通河西走廊，取得生活資源，順便到新疆取得蘇聯援助的大量軍火。1937年9月，國民政府發布中共起草的〈共赴國難宣言〉前夕，中共得到蔣中正的承諾，將對改組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中共紅軍提供糧餉和武器，也將對改組成國民政府陝甘寧特別邊區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政府提供政費。八路軍渡過黃河，進入日本敵後的河北、山西、察哈爾和山東四省，經三年的根據地開拓和發展後，到1939年日本軍隊停止全面性的正面進攻時，根據地非但可以自給自足，而且有餘裕幫助偏處於陝北後方的中共中央^⑪。

在此之前，因為莫斯科給國民黨的大量軍援以部分分撥中共為附帶條件^⑫，所以中共實際控制的軍隊和政權都能以中華民國體制一部分的名義取得財政支援。陝甘寧邊區政府因此在其控制區內得以實行輕徭薄賦政策，只向貧困農村徵收類似土地稅的救國公糧，而其總額佔當地糧食總產量的比率遠比國民政府各省為低。中共徵收公糧，訂有累進稅法，實際徵收時卻罕見依法行事。公糧徵收以縣為單位，甘泉、固臨和延川三縣有六至八成人口負擔公糧，但延安縣只有27.1%；鹽池縣更少，僅佔全部人口的15.6%。也就是說，只有地主和比較富裕的農民繳納公糧。當時邊區課徵公糧，鄉幹部稱為「抓大戶」：幾個人聚在一起，根據上級規定的數字，商定如何向下分攤，再召開村民大會「宣傳估定」的數字，哪家攤、攤多少。若指定公糧負擔戶拒絕繳納，則依「政治動員和法令相配合」的指示加以鬥爭；若依然抗拒不繳，則強制執行。1939年陝甘寧邊區只徵收5萬石公糧，農村的整體負擔不重，大多數農民得到豁免，但在甘肅環縣還是激起民變。1940年邊區課徵總額增為9萬石，雖然增約一倍，但民間猶有餘糧輸出。偶聞農民抱怨，或抗議自殺，卻沒有嚴重民變發生。這一成就，似乎與公糧徵收辦法的改進有關^⑬。

中共可以在大多數縣份實行七成以上農民不納公糧的收稅法，其前提是維持與國民政府的友好關係，繼續得到撥款。但是，兩黨合作在1940年底有全面破裂之虞。是年下半年，國民政府在華中日本敵後的軍隊和政權遭到中共嚴重挑戰。江蘇鹽城的省主席兼魯蘇戰區副司令韓德勤，忽然警覺中共大軍分北、西、南三路進入其統治區：北面是越過隴海路南來的八路軍，西面是長江以北、越津浦路而來的安徽新四軍，南面則是已渡過長江繼續北上的另一支新四軍主力。韓德勤集中武力，特別命令嫡系第八十九軍前往黃橋阻擊，以眾擊寡，然而慘遭敗北，軍長李守維戰死。蔣中正當時正透過兩黨中央談判，要求新四軍在12月31日以前全部北渡長江，並要求南下的八路軍和北上的新四軍在此一期限屆滿一個月之前，全部渡過改道淮水的黃河新道。由於此一要求為中共峻拒，國民政府一方面出動軍隊圍剿從皖南北上的新四

軍軍部及其戰鬥部隊，並宣布早已在長江以北的新四軍為非法，勒令解散；另一方面則立即全面停止對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寧邊區的撥款，並在邊區四圍調派軍隊，修築碉堡，建立封鎖線，既不讓邊區輸出任何多餘的物資，像鹽和皮毛，也不讓輸入任何邊區急需的物資，尤其是糧食、布匹和醫藥器材。國民黨想以經濟封鎖，窒息中共至死^⑬。

陝甘寧邊區從1939年以來，財政上還有第二個「外援」可恃。在華北敵後迅速擴大的中共根據地，主要是比較富裕的晉察冀、晉冀魯豫和山東根據地，都建立了政府和基層組織徵糧徵稅，也都向中共中央提供財政挹注。1939年7月，周恩來因為騎馬摔斷右手，在蔣中正協助下到蘇聯醫治，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間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在1940年每月從國民政府收到11萬美元，但從華北根據地收到20萬美元，後者佔每月所需收入約三成，是國民黨撥款的兩倍^⑭。這筆收入不比國民黨撥款穩當，因為不久之後，日本人受到「百團大戰」的刺激，對中共華北根據地加強進攻，華北根據地即將自顧不暇。

1940年秋，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這場戰爭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兩軍對壘，而是動員大量農民參與的鐵路、公路和碉堡破擊戰。最初由於日本駐防軍缺乏警覺，中共確實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戰果，但是日本佔領軍很快回過神來，站穩腳跟，並且因為領悟到中共根據地的威脅比國民黨根據地更為可憂，特別加派軍隊掃蕩和進攻。其實，早在1939年以來，日軍面對侵華戰爭長期化的可能發展，已不得不採取以戰養戰的策略，全力擴大對國共兩黨分別擁有的敵後地區的佔領、搜刮和資源開發，同時大力扶植汪偽政府並招降國民黨軍隊，尤其是其非嫡系軍隊，以為配合。百團大戰以後，在1941年夏，日軍先一舉清除國軍在晉東南的中條山根據地，再集中全力掃蕩和進攻中共華北各根據地。由於大量壓縮這些根據地的土地和人口，根據地的稅收頓時減少，已自顧不暇，不得不減少和停止對陝甘寧的財政援助。後來，毛澤東因為這個理由曾批評彭德懷擅自擴大甚至發動百團大戰，得不償失，犯上嚴重的軍事錯誤^⑮。

在日軍加強對敵後地區進攻的過程中，陝甘寧邊區愈來愈難從比較富裕的華北各根據地取得財政幫助。八路軍129師副師長徐向前於1939年6月率部前往山東發展根據地，建立政權，課徵錢糧。翌年6月，奉命回延安參加第七次全黨代表大會，便攜帶50萬元法幣隨行。這筆款項於1941年1月下旬送達延安最高當局^⑯。就在此時，國民黨對陝甘寧進行全面封鎖，中共中央認為50萬元法幣是杯水車薪，下令華北局立即籌送300萬元法幣救急。這批法幣分裝成五百個白布包，每包重三十斤，由人背負運送。但是在百團大戰之後，日軍加強對其佔領區的防衛，在平漢等鐵路兩側重新挖掘濠溝，深三公尺，寬五公尺，還灌水一公尺高，並設置更多崗哨，尤其加強在鐵道上巡邏。晉察冀軍區派人兩度試圖闖越封鎖線，均不成功，反而犧牲幹部。1942年2月，晉察冀軍區參謀長唐延杰再度嘗試，指示由延安前來招兵的團長兼政委李赤然率領新募士兵約六千人，遡返西北，並不辭勞苦和犧牲，護送這筆巨款到延安。李赤然選擇死士五百人，取道五台山北側，走山路到晉綏根據地的忻州，再南下陝北，在四個月內完成任務^⑰。此次運送法幣發生在百團大戰之後，日本人已開始加強對敵後根據地的掃蕩和進攻。根據地財政收入隨即迅

速萎縮，不僅難有剩餘，而且必須全力擲節開支，實行精兵簡政政策，將大批中高級幹部送往延安的安全地區，並接受整風運動的磨練。

1941年以前，中共陝北地區還可以從第三個途徑取得財政支援，其中最重要的是共產國際撥款，數目不定，也難以查考。當然，中共從莫斯科得到的財經援助在數量上難與國民政府相比，但是其重要性不容小覷，對邊區財政更有助益^⑮。首先必須指出，1937年11月底，毛澤東在延安迎接王明、康生和陳雲時，同機有一位紅軍參謀本部軍官安得烈亞諾夫(V. A. Adrianov)帶來巨款300萬美元，供中共重建軍隊之用^⑯。其次，則如前指出，周恩來曾於1939年赴蘇後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的收支情況，指中共月需約70萬美元，所以在國民政府撥款、華北根據地支援和黨費以外，尚不敷約35.8萬美元，佔全部所需經費的四成左右，請共產國際補足^⑰。1940年3月，周恩來偕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任弼時返回延安，就因為斯大林批准申請而親自帶回30萬美元^⑱。新四軍事件後，毛澤東面對國民黨停止撥款的經濟壓力，在1941年5月16日請求共產國際撥付預定的100萬美元^⑲。據當時官定匯價，這筆美元相當於2,000萬元法幣，黑市更不知道高出多少倍。7月3日，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德軍已展開十天左右的大規模進攻，蘇聯陷入危急存亡之秋，斯大林卻從容批准此項巨額撥款。兩個月後，也就是9月13日，毛澤東收到第一筆錢，共30萬美元，並隨即專電告知。1942年1月13日，毛澤東再次電告莫斯科，收到另一筆30萬美元的撥款。至於剩下的40萬美元餘款，尚不知莫斯科有無送出。毛澤東對德蘇戰役的戰況密切注意，當然清楚蘇聯失地千里，列寧格勒和斯大林格勒都為德軍包圍，而首都莫斯科更岌岌可危。在此情形下，他不可能再對共產國際的外援寄以任何期望。

外來援助，不論來自國民黨中央、新開闢的敵後根據地還是共產國際，加總佔1937到1940年延安中共中央歲入的一半以上；最少五成，最多七八成。可是1941年日軍在華北、國軍在華中分別對中共統治區積極進攻以後，這些收入的來源都迅速枯竭。同一時期，中共中央在陝北的財政負擔卻迅速增加。1937年秋，雖然延安有三萬多軍人開往日本敵後，加之政簡刑清，沒有太多脫產幹部，但是因為大量青年學生前來投奔，所以需要公家提供生活資源的仍有1.4萬人。1941年以後，因為日軍加強對敵後根據地的進攻，各敵後根據地為了減少不必要的作戰犧牲，將大批脫產幹部送往遠離戰火的陝甘寧邊區。同時為了應付國民黨的可能進攻，中共中央也調派原來在敵後的軍隊回到邊區駐防，因此1941年陝甘寧的脫產幹部和官兵人數高達7.3萬之多，約為1937年之五倍。

閩西張慕堯曾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的糧食局長，1941年初纔卸下邊區財政廳長的仔肩。他分析邊區的糧食問題時，即以上述7.3萬脫產人員為準，但特別指出，此外尚有8,000匹馬；每匹馬消耗的糧食為人的兩倍稍多，因此可以說陝甘寧邊區有9萬人的吃飯問題，亟待解決。張慕堯又說，陝甘寧人口，若包括20萬移民，約為200萬人，平均每百名農民要養活4.5個脫產人員。張慕堯所謂的200萬人其實是摻水數字，比較可靠的數字是140萬人，即平均每百名農民要養活6.5人。張慕堯估計，要養活這麼多的人畜，需要徵收公糧14萬

石，但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當年仍主張輕徭薄賦，堅持只收9萬石（後來實收9.7萬石）公糧，並計劃以法幣外匯購買1.87萬石。然而，國民黨的外匯分文未來，反而嚴禁糧食和其他戰略物資進入邊區；敵後根據地和共產國際自顧不暇，遠水也難濟近火。邊區各軍隊、學校和機關單位沒錢沒糧，等待下鍋糧食，都紛紛派人向財政廳催討撥糧²³。

在此關鍵時刻，張慕堯應新任財政廳長南漢宸之請，提出上述這番分析。南漢宸原為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從來沒有做過經濟工作。1941年2月，南漢宸從晉綏邊區前來延安向中共中央報告工作。一天晚上，毛澤東忽然緊急召見他。事先也沒說明理由，甫見面就要他轉任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長，負責解決陝甘寧所有脫產人員的吃穿問題，每星期報告一次工作情況²⁴。林伯渠是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照理財政廳長應由他延攬或任命。顯然，由於事情緊急，毛澤東已顧不了林伯渠的顏面，於是直接要南漢宸臨危受命。南漢宸甫就職，立即向農民大舉借糧。他學習俄國內戰時期紅軍的做法，派學校機關幹部組成的工作團到鄉下借糧。一次不夠，又借第二次；3月借了，8月又借，總共借了4.6萬石，才補足當年糧食缺口²⁵。

儘管南漢宸強調借糧都是靠政治說服，但是1941年6月上旬發生的一件事故顯示，農民對借糧還是有所抱怨的。當時邊區政府正召開縣長聯席會議，忽然大雨傾盆，雷電交加，有七人遭受雷擊，延川代理縣長李彩雲的傷勢最重，旋即不治。隨後即有農民詛咒，為何龍王抓走的不是毛澤東，而只是縣長李彩雲？政治保衛人員得到消息，立即展開偵查，並抓走一個農民。毛澤東了解情況之後，認為詛咒無罪，下令馬上放人。此一故事頓時成為毛澤東聆聽人民聲音的愛民佳話。不過，1941年9月開徵當年度公糧時，南漢宸便不顧林伯渠等人的輕徭薄賦主張，竟然建議毛澤東將該年度的公糧總額度從9.7萬石增至20萬石。南漢宸聽信前任張慕堯估算，認為邊區需要糧食14萬石，但是強調政府必須信守諾言，歸還借糧，於是多徵6萬石。為達成此一目標，他徹底廢除公糧攤派制度，堅持貫徹累進稅法原則，並透過制訂和修改法律，要農民自報公議。也就是說，由農戶自報收穫量，再由鄰里公議其確實性，從而把各縣負擔人口極大化，擴大到八成左右²⁶。

1942年，農村借糧已還，南漢宸沒有理由如數課徵，公糧總負擔才降為16萬石。雖然如此，當年確實沒有出現嚴重民怨和動亂，只是外來的二十幾萬移民怕負擔，都偷偷逃離邊區。或許中共號召減租減息，提倡農業生產，減低了不少農民企圖保留存糧的誘因，此後農村的公糧總負擔也沒再提高過²⁷。

陝甘寧邊區的脫產幹部和軍隊，有了吃的，但還需要穿的。棉布、棉紗都必須外來；他們也需要本地沒有生產的文具紙張和醫療器材，或其他生產不足的物資。這些境外物資都需要以法幣和金銀支付，可是國民黨停止撥款，敵後根據地自顧不暇，而斯大林無法施予援手。到底毛澤東有甚麼辦法渡過邊區這個財經危機？又以甚麼方法取得邊區所需棉布、棉紗，以及其他重要物資？答案就是文章一開始就說到的大量種植和輸出鴉片。

除非了解到這一點，否則中共出版的公開或半公開的相關文獻和回憶文字就永遠令人迷惑，閱讀時經常感覺不知所云。朱理治的回憶就證明了此一

論點。朱理治在1927年加入中共，原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書記，1940年從國民黨區的鄂豫邊西撤回延安。他在中央組織部結束長達一年的政治審查後，因為曾在清華大學唸過經濟系，於1941年3月奉命出任陝甘寧邊區銀行行長。文化大革命時，他再次接受政治審查，在反省自傳中回憶1941年8月邊區決定走計劃經濟道路，控制邊區對外貿易，並提出一份1942年的工作計劃。對此計劃，他有如下說明^②：

那時打算，鹽出口每年收入2,500萬法幣，其中貿易局可收2,000萬法幣。各根據地給中央外匯，可以取得700萬，糧食出口，貿易局可以拿到200萬，三邊毛皮出口可以收入20萬，毛線、毛毯、毛衣可以拿到60萬，整個邊區有6,900萬法幣買賣。貿易局可以拿到5,100萬，而邊區需要外面入口的用品共計8,100萬法幣，與出口的1,000多萬法幣的差數，我想用禁止香煙入口和鼓吹出口的办法來解決。

因為特貨和鹽在我們手裏，財政上又不拖累，我想1942年金融可以穩定，當時是抱着樂觀態度的。到1942年2月，特貨統一了，對外面來的大批貨，我們可以用特貨抵法幣，政府重申了禁用法幣的禁令，各地又設立了三十幾個貨幣交換所，兩相配合，邊幣流通範圍擴大了。這時，友區緊縮通貨，開始限價，大批東西來邊區賣，使邊幣穩了幾個月。為配合特貨統一，又搞有獎儲蓄，並發行了1,000萬元，買了880萬貨物。

朱理治接着又說，他在1941年10月寫信給邊區三大巨頭林伯渠、高崗和賀龍，建議成立邊幣(邊區貨幣)平準與業務兩基金，全部金額在2,500萬到2,700萬邊幣之間，並建議以「特貨」3,750斤為基金，支持邊幣價格^③。

如果不知道「特貨」就是鴉片的話，上述朱理治的話就變得不可解了。因為不知道特貨是甚麼，除追問它到底是甚麼外，還會追問「特貨統一」是甚麼意思。是否指邊區銀行通過貿易局統一和壟斷對外貿易？還是另外有特別意思？為甚麼銀行提出計劃時反覆說特貨統一可以穩定金融，可以支持邊幣價格？為甚麼特貨以重量「斤」為計算單位，並且可以起到類似金本位制度下黃金準備金的作用？既然特貨可抵法幣，為何列舉換取法幣外匯可能來源時全不提特貨之名？朱理治說鹽收入2,000萬元、皮毛80萬元、餘糧200萬元、敵後根據地貢獻700萬元，少了2,120萬元法幣沒有着落。他接下來說可以靠鹽和特貨抵法幣。除鹽和皮毛以外，邊區究竟還有甚麼東西可以走私賺到2,120萬元法幣呢？為甚麼1942年要賺1,000萬元法幣，除減少香煙走私以外，還要鼓勵輸出？又邊區有甚麼貨物可以鼓勵輸出呢？問題一大堆。如果讀過梁愛民的回憶文章或本文緒論提到的幾篇論文，對朱理治這段回憶當然不會充滿困惑；沒讀的話，就會覺得唸朱理治的回憶錄簡直像唸天書。當然，知道「特貨」是鴉片，也就很容易理解何以1942年中共在邊區成立禁煙督察處，重申境內人民和其他機關的鴉片禁令，同時成立土產公司，加強特貨統一輸出。難怪朱理治對賺到2,120萬元以上的法幣會有十足把握；也難怪他會因為官方機構掌握大批特貨，而對平衡邊區對外貿易有偌大信心^④。

如果不知道中共曾經大量栽種和販賣鴉片，則《謝覺哉日記》中的三句扼要簡短的話可能也不會受到任何注意。二十八年前我就是這樣才注意到日記中的材料。謝覺哉乃是清末秀才，1925年入黨。1941年5月毛澤東成立中央西北局，逐步集中黨政軍大權於書記高崗一人之手後，謝覺哉出任西北局委員。11月以前，他還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其後則改任邊區議會副議長兼邊區政府黨團書記。當年他的歲數已將近一甲子，在延安被尊稱為五老之一。他的日記逃過文革時紅衛兵搜索私人文物的浩劫，終於在1984年問世。其在1945年1月15日日記討論仁政觀點時說：如果一個人，只想「愷弟君子，民之父母」，自以為是父母官，「把人民當作受恩者」，則其仁政觀點是錯誤的、是假的；正確的仁政觀點應該是「為人民當勤務，生怕主人受損」。他又進一步說，有仁政觀點者怕人民受損，無仁政觀點者則只是想賺錢謀利。在這個有關仁政觀點的長篇討論中，夾雜着如下三句話：「毛說我黨犯過兩次錯誤，一是長征時亂拿人民東西（不拿不得活），一是種某物（不種度不過難關）。」^⑤

乍一看到，這三句話也是不知所云。如果知道第一句話的「毛」是毛澤東簡稱，而「我黨」則指中國共產黨，則毛澤東顯然認為自己是黨，而黨也就是自己。理解第一句話後，馬上想問：到底犯下甚麼錯誤，讓毛澤東感到如此內疚呢？如果對中共歷史上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有所理解，則不難理解第二句話。1935年毛澤東率領中共紅軍路過四川西部的藏族地區時，既凍且餓，看到兩旁麥田已熟的青稞，卻遍尋不着附近藏民，所以未徵求田主同意，便擅自搶割充飢。毛澤東雖然承認錯誤，但還是要為自己辯護，強調不擅自搶割，大家會餓死，所以不得已而為之。還有甚麼其他錯誤，嚴重到可以與此相提並論呢？謝覺哉的第三句話有三個字：「種某物」。他寫這幾句話前四天，聽毛澤東在邊區表揚勞動模範的群眾大會上說：「不生產，沒有大米、小米、棉花、棉布，閻王請你喝燒酒，死路一條。」^⑥顯然，謝覺哉所說的難關是1941年以來的財經難關，而此時中共已發起大生產運動，種糧種棉，此外還能種甚麼其他作物呢？為甚麼種這種作物是嚴重錯誤，毛澤東卻認為「不種度不過難關」，不得已而種之呢？謝覺哉知道答案，可是不敢明寫，給人欲語還休的感覺。囁嚅之後，謝覺哉強調，毛澤東有真正仁政觀，所以犯了這個錯誤後會自我批評。不像那些無仁政觀點的人唯利是圖，不僅外銷鴉片，還內銷鴉片；不僅把鴉片外銷到國民黨區，還把鴉片內銷給邊區農民。謝覺哉當然不會問，作為外銷對象的國民黨區人民算不算中國人民，為何內銷外銷有那麼大的差別。

無論如何看待謝覺哉的討論，這則日記為我們證明：1941年以來邊區大量栽種和走私鴉片，毛澤東不僅知情，而且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下達過命令。儘管他像許多中國讀書人一樣，對帝國主義國家或其他政權大量栽種和販賣不名譽的鴉片，撻伐不留餘地，但是為使中共克服1941年以來邊區人員沒吃沒穿的困境，他雖不得已，仍下令弛種弛禁鴉片。謝覺哉留下這個記錄時，沒提到他當年曾經力諫毛澤東不可支持鴉片弛禁，僅強調有些幹部除栽種之外還搞自銷，以邊區百姓為芻狗；以此顯示他們人格之低下，與毛澤東有霄壤之別。

三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鄧加榮和韓小蕙於1993年出版了《南漢宸傳》，到2006年此書又推出新版。全書結構有明顯變動，內容則大體未變。奇怪的是，題目增添「開國第一任央行行長」九字，作者卻少了一位；仔細閱讀，則發現原書可能招人眼目的幾段文字被刪除了^⑳。根據原書這幾段文字，我們可以摸索一下中共大量種植和販賣鴉片決策的過程。鄧、韓兩位作者透露，1941年3月，毛澤東任命南漢宸為邊區財政廳長後不久，即特別規定南漢宸每星期須向他報告工作進展，也就是如何解決邊區7.3萬人的吃穿問題。這一指示顯示毛澤東決心密切掌握陝甘寧的財經狀況。到8月，毛澤東更要南漢宸加入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參與重大財政經濟的決策^㉑。這個委員會對中共應否大規模栽種和販賣鴉片曾發生嚴重爭辯。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前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和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三人明顯贊成和鼓吹，但林伯渠、謝覺哉，以及邊區強人、西北局書記高崗都強烈反對。1942年初，三人更聯名連寫數封長信給毛澤東，剖析鴉片栽種和買賣的利害得失，要求勢必出面制止。他們表示，陝北過去碰過不少經濟困難，卻從未想到做大煙買賣，即便現在財政經濟惡化到沒吃沒穿的程度，也寧願餓死，萬萬不願看到邊區罌粟遍地，盡棄前功。鄧、韓在著作中沒有使用「鴉片」和「大煙」兩個詞，用的是「土特產」三個字。土特產若指食鹽、甘草、皮毛或其他農產物，三人怎麼可能如此大費周章，冒大不韙，向毛澤東進諫^㉒？

鄧、韓兩人又透露，南漢宸曾明確主張：國民黨軍閥經由綏德運送鴉片，使該縣的義合、宋家川和螞蚱峪三地都發展成為有幾萬人的繁榮大鎮，為何不能加以師法？綏德在抗戰爆發初期是國民政府劃給中共的河防區和募補區，中共駐有軍隊，但大部分縣境仍由國民政府設置的專員和縣公署管轄，直到1939年這些衙門才全部被驅逐出境。中共接管綏德以後，是否發現當地有鴉片走私，卻不依令加以取締，反而網開一面？對其中緣故，作者並未加以解釋，只是說：毛澤東收到西北地方領袖的堅決反對信後，要南漢宸立即前往楊家嶺辦公處，商量如何應付反對聲音^㉓。

南漢宸接到毛澤東召請前，發生了一件事情，說明南漢宸為了解決邊區的吃穿問題，已無所不用其極，不怕得罪邊區任何重要領袖了。當時，陝北正是春耕開始季節，各機關單位都等財政廳撥款，以便購置所需工具，於是都派人前來催撥，財政廳會計科長無現金應付，乾脆躲藏不見。當時有一位新到延安的年輕記者闖入財政廳，向南漢宸採訪1941年派徵糧工作團下鄉的事情。南漢宸要他自己下鄉採訪，並主動提供馬匹代步。事後，會計科長抱怨眼前連下鍋的米都沒有，如此不問事情緩急，委實匪夷所思。南漢宸聽到抱怨，立即召集財政廳緝私隊，也不詢問下屬詳細情況，徑直撲往高崗的保安司令部軍需處，強行沒收十三箱「肥皂」，隨後以「肥皂」換得現金，建立政府預算戶頭，這纔解決會計科長手無分文的極端窘境^㉔。這十三箱「肥皂」如果是真肥皂，怎可能發揮如此巨大的財政作用呢？若記得梁愛民說，「肥皂」經常是鴉片代稱，那就不難理解南漢宸確實知道如何解決燃眉之急了。他率

隊闖進保安司令部軍需處的理由是，軍需處不得私自保留「繳獲」物資，全部必須交付國庫。軍需處繳獲的若是真肥皂，怎可能不允許私下保留呢？顯然南漢宸看準了所謂「肥皂」就是司令部繳獲的走私鴉片，所以理直氣壯地加以沒收，沒收以後卻可以變現運用。軍需處的上級是保安司令高崗，南漢宸背後如果沒有更上級的人撐腰，豈敢亂捋虎鬚^⑳！軍需處迫於單位的伙食和經費壓力，顯然已涉足鴉片生意，事先未必獲高崗授權，卻也不可能完全瞞過高崗。高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卻也不敢公然挑戰政府法令，包庇犯罪，所以南漢宸敢於侵門踏戶，武裝執法。他的動機是解決各機關單位的伙食問題，毛澤東即便不以他的行動為然，也不能出面干預；何況內心也無法否認，南漢宸的做法確實不失為解決問題之道。

此事情發生後不旋踵，南漢宸接到財政廳副廳長霍維德報告，毛澤東要他前往辦公處商量如何回應林伯渠、謝覺哉和高崗的幾封信。南漢宸一見到毛澤東便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說當時渡過財政難關的所有棧道已全部堵塞，「只剩下暗渡陳倉一條小路了，不走陳倉小路，我們就都得憋死、困死、餓死」^㉑。鄧、韓言下之意，暗渡陳倉是南漢宸的建議。但是他們忘記了十三箱「肥皂」的故事，南漢宸每星期要向毛澤東報告解決延安吃穿問題的工作進展，毛澤東怎可能不知道南漢宸為了解決無米之炊的困難，很可能已經涉足鴉片販賣？其實在此之前，毛澤東也已經通過朱德和任弼時默許、甚或鼓勵，要王震領導的八路軍359旅到延安南部的爛泥窪（即南泥灣，下詳）大量種植和販賣鴉片。因此一聽到南漢宸堅持暗渡陳倉是唯一活路時，迅即回答道：情勢那麼嚴重，「難道我們不會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嗎？」^㉒毛澤東這句話清楚表示，他同意大量種植和販賣鴉片，僅針對此一政策，在執行層次上需有重要配套措施。他熟讀歷史，知道暗渡陳倉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明修棧道作為掩護之故。楚漢相爭，劉邦有意出漢中，奪取秦朝故地：明修棧道，示以佯動；暗渡陳倉，才是主要進攻方向。本來兩計一明一暗，一虛一實；毛澤東則強調雙管齊下，陰陽互濟：一方面同意暗渡陳倉，即暗中種植和販賣鴉片；另一方面堅持明修棧道，亦即號召大生產運動。在毛澤東看來，組織和動員幹部生產，既可以解決部分財政危機，也可以起到以「合法」掩護「非法」的作用；也就是說，檯面上的明修棧道可以掩護檯面下的暗渡陳倉。暗渡陳倉和明修棧道，乃是左右兩個拳頭，更是飛鳥的雙翼，相輔相成，不可缺一；暗渡陳倉固然核心緊要，但如果不益以明修棧道，也容易招致外界偵知，最終不可能單獨達到的目的。

毛澤東最後告訴南漢宸說，中共只有三條路可走：餓死、散夥和弄錢。弄不到錢，買不到邊區所需的糧食和物資，便只好餓死；要不然就散夥不幹。若不想走這兩條路，就只好老老實實弄錢。弄錢沒別的辦法，唯一辦法就是栽種和販賣鴉片^㉓。不走這第三條路，走哪一條？毛澤東的結論不言而喻。不過，栽種和販賣鴉片為國內外輿論所不容，不能公然為之，何況大張旗鼓？因此必須暗渡。然而明修也決非虛幌一招，除可以掩蓋視聽以外，更可爭取同情，尤其像大生產運動，實質上也可以幫助渡過財政難關。

毛澤東明修棧道，鑼鼓喧天。1941年除號召軍民大生產運動以外，更致力於鹽的生產製造和輸出。抗戰爆發前，陝北靠近寧夏地區有花馬等鹽池生

產岩鹽，惜品質不佳，且成本昂貴，故解決民間食鹽需求，仍然主要仰賴沿海兩淮、長蘆或晉西南河東鹽。抗戰爆發以後，日本人佔領沿海城市、鐵路、公路以及主要水道，兩淮和長蘆鹽的來源斷絕，西北地區的缺鹽現象變得異常嚴重。1941年中條山戰役後，國軍喪失黃河以北的最大根據地，日軍進一步鞏固其晉南汾河兩岸的統治，加強封鎖，不讓河東鹽西去，花馬等鹽池的食鹽頓時變得具有競爭力。問題是如何突破國民黨封鎖，向境外大量輸出^④。1941年夏收前，南漢宸在朱德和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蕭勁光的支持下，已組織士兵生產食鹽6萬馱（佔全部產量的十分之一），品質比民產尤佳。南漢宸解決了食鹽生產製造問題，但是如何運輸出境，仍然是亟待解決的困難。朱德、任弼時都主張動員和組織農民運輸，可是林伯渠和謝覺哉研究邊區地方志後，堅決反對。他們指出，陝北道路崎嶇，溝深坡陡，升降困難，大多數農民向來畏運鹽公差如虎，因為成本過高，非但不能獲利，反而必然造成民力和牲畜的雙重損失。朱德和任弼時說服不了他們兩位支持，於是聯合高崗，「說服」酈縣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動員和組織農民運鹽，以事實「證明」反對意見的謬誤。毛澤東更給《解放日報》推薦魯忠才經驗的調查報告寫了按語，據以駁斥林、謝兩人的主張。林、謝迫於壓力，終於同意大規模動員和組織農民運鹽^⑤。惟毛澤東不是完全聽不進反對意見，也允許部分地區把運鹽當作力役，繳納公鹽代金，以為豁免，避開嚴重反彈^⑥。

1941年底，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要所有參與的政治局委員和其他高級幹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此次會議上林伯渠便不得不自我批評，說自己相信古人的地方志，反對動員和組織農民運鹽，其實是讀死書，雖不是秦邦憲和張聞天的「洋教條主義」，卻十足是「土教條主義」，此後一定全力支持毛澤東等人積極動員和組織農民運鹽的決定，擴大食鹽外銷^⑦。軍隊於是加強投入生產，農民則不斷以近乎力役的方式協助運鹽。1941年全年，陝北定邊官民共生產鹽40萬馱，農民運銷30萬馱，成績極佳。第二年，毛澤東更要隴東專員以及陝北各縣縣長親自帶頭，組織運輸隊大量運銷食鹽，食鹽收入因此也成為平衡陝北貿易的一個重要部分^⑧。

鹽利固然豐富，但賺錢遠不如鴉片，故在明修棧道的同時，中共中央更加緊暗渡陳倉之舉。1942年2月6日，南漢宸在跟毛澤東交換如何回應邊區內部反對大量栽種和販賣鴉片的意見後，出席一個性質不明的大會，報告邊區財政經濟情況。作家蕭軍不是黨員，也被允許前往聆聽。他在當天日記留下一則記載，內容如下：南漢宸在這次大會上報告說，邊區的財政經濟狀況已陷入山窮水盡的絕境。凡是能想到的解決辦法，除殺人以外，都已想到。百般無奈之餘，只好求助於「製作鴉片煙膏」。蕭軍聽後感慨異常，留下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革命的花是從最卑污的糞壤裏開出來的。」^⑨如果蕭軍知道南漢宸的報告就是毛澤東所支持的，而毛澤東在南漢宸報告鴉片問題前五天，也就是2月1日，纔在中央黨校發出全黨整頓三風（學風、黨風和文風）的號召，更針對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歷史，進行路線層次更全面且更系統的檢討，則不知道他是否會有其他聯想：毛澤東在樹立一貫正確形象的同時，竟然迫於國民黨經濟封鎖造成的財政困難，而不得求助於不名譽的鴉片——雖然可以理解 and 接受，終究有損其英明形象。5月3日，延安

召開第一次文藝座談會的次日，蕭軍在當天下午見到在南泥灣及其附近屯墾的359旅旅長王震，聽他述說如何自力更生，用「煙土」換老牛吃肉，改善部隊伙食，不免感動，並對這個鐵路燒火工人出身的高級軍官刮目相看，不禁肅然起敬，大讚其聰明過人，切實有為⁴⁸。

關於種植和販賣鴉片的決策過程，中共官方諱莫如深。從朱理治主持中共邊區銀行工作的回憶中還可以多發現一些端倪。朱理治回憶，他在1941年初出任陝甘寧邊區銀行行長後，立即發行618萬元法幣債券，並以其大部分發給各機關部隊作為生產資金，要他們自謀解決部分生活需要。朱理治沒說的是，許多軍隊、學校和機關單位的負責人領到下發的生產資金後，還需要解決如何運用的問題。他們立即發現種地最費時間和勞力，不如做生意賺錢可以快速滿足需要。因此之故，邊區一時之間曾出現全境皆商的局面⁴⁹。在這一段時間，許多軍隊和機關單位迫於自籌生活經費需要的上級壓力，已開始販賣和種植鴉片，惟做法分散，並無統一負責機關。對這些情形，毛澤東最初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約略同時，朱理治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挑戰國民政府的貨幣發行獨佔權，發行邊幣，專供邊區官民使用，發行量定為1,000萬元。發行以後，儘管有法幣現鈔與公糧稅收作為保證，仍無法防止貶值。官方的價格是1元邊幣可兌換1元法幣，黑市的價格跌為1元邊幣只能兌換5毛法幣；有些地方商人甚至拒用。林伯渠和時任邊區議會副議長謝覺哉認為邊幣發行量已經過多，所以產生貶值現象，要求量入為出，緊縮發行⁵⁰。然而，朱理治的上司不限於邊區政府，在黨組織系統上，他還要聽命於西北局書記高崗。高崗與他積不相能，而此時毛澤東正責成政治局委員朱德和任弼時兩人落實西北局一元化黨領導的政策，將西北地區（包括陝甘寧和晉綏兩邊區）的黨政軍大權全部集中於高崗一人之手。他們三人都不同意林、謝兩人的主張，認為發行邊幣，必須量出為入。之所以如此主張，是因為要提供資金給軍隊、學校和機關單位從事生產，而不論該單位從事墾殖、製造食鹽、經營商業或是從事貿易（其實是違反國民黨法令，進行走私，打破經濟封鎖），都可以活絡和繁榮經濟；何況增加對外輸出，可以平衡邊區對外貿易，整體說來有利於邊幣價格穩定，故力主多發行邊幣。夾在左右兩派主張之間，朱理治難以下定決心，遂向最高層的毛澤東請示。毛澤東未有立即回應，僅告訴朱理治，茲事體大，須由中共中央決定，要他耐心等待回音⁵¹。

在等待期間，朱理治於1941年7月18日在延安邀請三邊商會代表團座談，試圖解決如何有效運用多發行邊幣所取得的資金。照理商會最關心的是貨幣貶值問題，但朱理治回憶這次座談會的內容時記得最清楚的是：「座談過一次，想到賣特貨的辦法，並到金盆灣去實地考察了一次，與717團商量，由銀行投資。」⁵²朱理治沒解釋為甚麼在座談會上會想到賣特貨的辦法，重要的是，如果記得「特貨」就是鴉片的話，再知道717團是王震359旅的直屬部隊，團長陳外歐、政委晏福生（後改為李銓）奉令前往延安南部的爛泥窪開墾，那就會對他的行動了然於胸了。717團部設在鄰縣固臨一個叫臨鎮的大地方，開墾地卻是延安爛泥窪北端的金盆灣。金盆灣有三條河流會合的南陽府川，東流次第為虎洞川和臨鎮川，水土肥沃，適宜墾植。717團此時顯然已從事特貨

生意，很可能也已開始種植鴉片了。7月，距離鴉片收穫季節不到一個月，朱理治因而親自前往考察，並決定大量投資717團的特貨及其加工事業。隨後，邊區財政廳提出1942年財政預算，邊幣發行總金額為5,000萬元，朱理治則建議增加至少50%，提高到8,000萬元⁵³，毛澤東當然立即同意。他顯然認為增發邊幣可以有效投資利用，所以拒絕林伯渠和謝覺哉的建議，決定擴大預算規模，並要朱理治放膽擴大邊幣發行。

毛澤東經甚麼渠道處理林伯渠等人的反對意見，值得稍作探討。他知道從中共中央遷移到陝北以後，邊區的財政經濟實際均由邊區政府作主，但名義上中共中央仍設有所謂財政經濟委員會，職司財政經濟決策，並控制中共中央和陝北的預算⁵⁴。這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即為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如前指出，他從1941年初以來，就極力反對朱德和任弼時動員和組織農民運鹽的主張，故毛澤東對他有所譏評，更責令他檢討和自我批評。同年6月，毛澤東更通過中央政治局會議，全面改組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會原有九名委員，林伯渠是唯一中央委員，副主任委員李富春雖是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卻只是勉強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候補委員；其餘七位委員則連候補中央委員的資格都不具備。毛澤東改組時，不動林伯渠和李富春的位置，但指示其他七名委員全部去職，另由位望崇高的朱德、任弼時和高崗替補。任弼時和朱德分別是政治局正式和候補委員，高崗則是被毛澤東提拔為西北局書記的陝北地方黨領袖。如前所說，兩個月後，毛澤東又欽點邊區財政廳長南漢宸參加這個委員會。透過這些關鍵的人事更動，毛澤東可以完全控制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決策；即便林伯渠再有反對意見，也不愁沒人代表毛澤東的立場，並為他取得多數票了。

1942年以後，在南漢宸和朱理治諸人的直接領導下，食鹽和鴉片成為中共陝北財政的兩大支柱，一白一黑，而黑色的鴉片尤其重要。前面提到，1942年特產貿易（即鴉片貿易）所得佔邊區全年歲入的40%，1943年佔40.82%。1944年以後，中共改變發布數字方式，宣布特產解決當年財政開支26.63%，解決1945年財政開支40.07%⁵⁵。陝北的社會經濟史學者黃正林說，中共並未將「特產」列入公布的對外貿易統計表裏。根據這些統計表，1945年邊區貿易進口總值為20億元幣券（對抗邊幣貶值另外發行的新貨幣），而出口貨物總值僅10億元，一進一出，兩者之間出現10億元赤字。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組數據中，號稱「金雞母」的食鹽，僅賺進5,000萬元幣券，佔出口總值5%。黃正林在討論邊區的對外貿易後，又單獨討論「特產」一項輸出物，但未告訴讀者「特產」是甚麼，只是指出「特產」的輸出，在1945年為邊區賺入40億元幣券。與此數字相較，食鹽輸出所賺取的可說是微不足道。如果知道黃正林所說的「特產」是鴉片，則對兩者間利潤相差之懸殊不會感到驚奇。黃正林進而指出，如果邊區的對外貿易納入「特產」計算，則「特產」在1943年佔出口總值45.87%，1944年佔70.79%，而1945年增為78.91%⁵⁶。

如前所說，1942年中共走私鴉片至少在2,000萬元法幣以上，但同年邊區境內也出現不少煙民。煙民人數不詳，但消耗的鴉片據說總值高達百萬元邊幣以上；換算成法幣，價值在30萬到50萬元之間。中共黨史工作者齊霽說，這些鴉片來自日偽佔領區⁵⁷，其實有相當部分來自邊區自家人的栽種和走

私，也就是謝覺哉在日記中批評的自銷^⑤。不過，從1942年開始，邊區禁毒禁煙的法令愈來愈細密，當然執行上有一定的績效，但法令貫徹的程度也不可以誇大成弊絕風清。1943年11月，蕭軍因為不滿於政治，主動要求到鄉下去自食其力，在延安附近的鄉下待了四個月，他非常驚訝於當地的大煙和賭博同樣流行。或許是誇大其詞，但他的觀察還是令人懷疑陝甘寧邊區是否完全禁絕了吸食鴉片^⑥。

四 爛泥窪變成南泥灣

爛泥窪原來是固臨縣（原由宜川四個區和甘泉一個區構成）的一部分，後來劃入延安縣，成為其南部金盆區的一個鄉，前臨黃河，背倚鄜縣和甘泉兩縣。延河和洛河成夾叉形東流，一偏東北，一偏東南。兩河之間的黃龍山是大分水嶺，將全鄉分為東北和西南兩部。山脈向陽部分有臨鎮川，東流為雲岩河，再東流入黃河。臨鎮川與延河主流之間又有小分水嶺；臨鎮川和南邊的黑蛇川之間也有一道小分水嶺。全鄉縱橫各約80里，面積6,400方里。中心地區有三道河川，南盤龍川由西而東，九龍川自南而北，在爛泥窪會合成為南陽府川，再向東北流向金盆灣，再東流即為臨鎮川。整個鄉是山林地帶，其中可開墾土地達100萬畝之多，但是有水利的川地只有1.5萬畝^⑦。1940年，此鄉僅有二三十戶人家，集中於南陽府川，河川上游罕見人煙。耆老相傳，七十年前該地爆發回亂和捻亂，回漢相殺，加上左宗棠湘軍燒山，遂淪落為窮山惡水，水惡不能飲用，充滿腐敗物質，婦女飲後不能懷孕；即便懷了小孩，長成以後也會有柳拐子的畸形。深山森林密布，不見天日。平地則布滿荊棘，雜草叢生。霜降來早去晚，1941年遲至5月28日猶有晚霜，而同年剛到9月上旬已有早霜，估計適宜種植的時間僅百天左右。由於農民不願意前來開墾，豹子和野豬很多，爛泥窪一度是土匪窩^⑧。

1940年底，中共中央為了因應國民政府遲發和停發軍費和政費，已根據毛澤東「獨立自主、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指示，把中央財政部一分為三，即中央機關、軍隊系統和邊區黨政機關各設一個財政經濟處。中央財政經濟處處長鄧潔（即北伐時期的鄧鶴皋）遂動員中央秘書處、中央財政部、中央組織部和中央青委會等機關的人員前往爛泥窪開墾^⑨。鄧潔從固臨縣政府取得公糧300石，建立中秘、中財、中組、中青四個農場。不過當時開墾的主力是各機關的雜務人員以及少數強壯的基層幹部，並不像後來那樣，機關單位的全部人員都參加農墾。

第二年春天，鄧潔上司、中共中央副秘書長李富春告訴朱德，爛泥窪有廣大土地可以開墾，同時也要鄧潔找調查過爛泥窪土地資源的農學家樂天宇向毛澤東和朱德匯報情況。隨後，朱德即在樂天宇陪伴下三次前往勘查^⑩。朱德提出開墾建議，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即下令當時駐防綏德的王震359旅率領全軍前往。在此前一年，王震已指揮全旅驅走國民黨的綏德官員，並奉令像陝北其他學校、軍隊和機關單位一樣，「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只是尚未動員戰鬥部隊種地，僅任由轄下部隊像其他單位一樣經商，譬如成立客貨

棧，以中間人身份協助來往商人交易貨物。對路經駐地的鴉片走私，359旅採取視而不見的政策，所以南漢宸發現綏德的義合、螞蚱峪和宋家川都出現畸形繁榮^④。當時中共軍隊和公家單位的客貨棧間有中介和包運走私鴉片的服務，王震359旅的大光商店(下詳)就有嫌疑，只是尚無確切資料證實而已^⑤。1941年春，王震奉令率領全旅開往邊區南大門的爛泥窪。此時359旅717團已經率先進入爛泥窪開墾^⑥。對該團具體的開墾事宜，我們一無所悉，只知道王震旅部及718團、719團等部相繼進入爛泥窪開墾的情形。

王震到達時，爛泥窪已經從固臨縣劃出，歸延安縣管轄，名義上作為移民墾荒區，實際上是由八路軍創設新中國大農場，作為軍墾之用^⑦。此時爛泥窪應該已看不到土匪蹤迹。約略同時，也就是1941年5月，718團開抵717團附近的金盆灣；兩個月後，八路軍炮兵團接踵而至；11月，警衛營開抵墾地。炮兵團和警衛營開抵時，種植季節已過，恐怕都沒有接觸真正農事。這一年還有101家農民前來開墾，不清楚是有計劃招來，還是聞風而至。718團等部隊抵達爛泥窪後，立即開始搭帳棚，挖窖洞。罕見的當地原有農戶對他們一般不表歡迎，所以軍隊必須自己解決吃住問題；工具則向延安縣政府、延安各機關以及當地農場和農戶借用，惟數量極少，基本上兩個勞動力才有一把工具，有時一個班只有兩把。土地問題最易解決，由軍隊自己劃定，沒有任何限制。

這一年，718團共種9,600畝地，在爛泥窪境內則僅種2,800畝，收成糧食355石，蔬菜30萬斤；但是種植糧食和蔬菜已經不是唯一的工作。為了種植「特產」鴉片，部隊已透過農場「管理處」，特別向老百姓調劑了幾千畝川地^⑧。這個管理處的處長是北平大學農學院畢業的李世俊，當時職銜是八路軍總司令部爛泥窪墾區主任兼總農場場長。幾千畝川地都是種鴉片的上等田地，如果沒有總司令朱德的明確指示，很難想像359旅旅長王震敢擅自在開墾爛泥窪的同時如此大規模地涉足鴉片種植^⑨。放在這個脈絡中，就容易理解為何1941年6月朱德會寫信給718團團長陳宗堯等高級軍官，鼓勵開荒，建立畜牧業、運輸業、手工業和商業，並告訴他們中共中央最近成立財政經濟部，負有系統指導他們工作的責任，要求服從它的指揮^⑩。如果爛泥窪只是單純開墾和做普通生意，朱德似乎沒有必要特別叮囑。顯然，他已經下令種植和販賣鴉片。同年9月，為了宣傳爛泥窪墾區軍隊自力更生，自己解決吃穿問題，要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這時可能嫌地名不雅，改成「南泥洼」^⑪，不久以後又嫌「洼」字有不好的意思，再次改名為「南泥灣」。此後新名字流行，就鮮有人知道爛泥窪這一本名了。

1942年，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決定擴大種植鴉片規模，在南泥灣擴大原農場管理處，仍以李世俊為主任。除上述部隊以外，又在該年3月開來特務團，進駐灣內馬坊；6月，開來719團，進駐灣內九龍川；8月，開來四支隊，進駐地不詳。所有部隊的中心工作都是在農業開墾的同時種植鴉片；農場增加為三十餘個，農戶增加為243戶。據中共中央西北局辦公廳邊區研究室的調查報告指出，本年南泥灣總共種地15,000畝，其中川地9,000畝(機關部隊種3,000畝，農民種6,000畝)。359旅718團種地5,000畝，其中1,000畝種鴉片，收穫300兩。炮兵團種600畝鴉片，種活80畝地，收穫幾十兩。另外，特

務團收穫鴉片100兩，警衛營收穫800兩。邊區的調查幹部說，炮兵團之所以收穫那麼少量，是因為種時貪多，不信農民意見；不能在熱天下種；而下種後既不懂施肥，也不懂割煙，加上種子都是1935年前保存下來的，所以收成不佳。這幾個單位合起來才收穫1,300兩鴉片不到^⑳。據同一份調查資料說，718團的畝產僅3.3兩，岳謙厚研究民國時期在晉西北種植鴉片，卻說當地畝產40至50兩，兩者相差超過十倍之多，委實令人不解。即便根據一個匿名專家所說，晉綏地區種植鴉片，旱地畝產6至7兩，水田高達八至十倍，平均產量是一畝20兩，人們也會發現南泥灣全部鴉片田的平均產量，一畝不到1兩，低到不可思議，何況南泥灣的鴉片田應該都是新開闢的水田。

南泥灣的鴉片產量非常可疑。1941年8月，邊區貿易局成立土產公司，對鴉片實行統購統銷。第一年統銷鴉片1萬斤，第二年增為3.6萬斤。如果這些數字都正確無誤，則南泥灣生產的鴉片總量只是其中極少一部分，連1至2%都不到。下面一些蛛絲馬迹的資料，令人懷疑西北局人員調查南泥灣的鴉片生產時，359旅高級幹部並未據實全盤以告。無論如何，我們沒有359旅種植鴉片的全部資料，只有趙本清、樂天宇兩則資料可供我們想像種植的景觀。718團衛生員趙本清，四川廣漢人，出身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回憶隨軍開入南泥灣後，因為需要醫療器材，便帶着背包上山採集鴉片，然後賣到國民黨區，以所得購買急需器材。他沒說明何以上山就可以隨便採到鴉片，但是提到這次經驗發生後，他的部隊開始種植鴉片，只是強調沒販賣給普通老百姓而已^㉑。更有意思的是，考察過南泥灣一帶農林資源的農學家樂天宇在1941年前往邊區製藥廠參觀，發現有很多土產藥材未被使用，深感可惜。於是兩年後在《解放日報》發表〈陝甘寧邊區藥用植物志〉，提到罌粟科的罌粟。他只是說舊社會時代罌粟產量甚大，但沒有說陝北建立新社會後是否還見過。如果新社會裏罌粟已經絕迹，則特別提到這種植物不知是否多此一舉。樂天宇介紹同為罌粟科的白屈菜時，更顯得有點奇怪——明明看過圖片即便會知道此花全然不類於罌粟花，他卻拼命強調白屈菜「略像罌粟」，果實細長有毒，牛羊不食，在延、洛兩河流域的分水嶺上到處可見，最多的地方則是南泥灣新中國大農場境內的向陽山坡，產量極大^㉒。看到這段文字，不產生遐想也難。

岳謙厚引用史志誠主編的《陝甘寧邊區禁毒史料》說，1943年陝甘寧邊區因為顧及中外觀瞻，迅速停止種植鴉片，把供應地轉移到中共晉綏根據地。以前史志誠的書在台灣無法看到，所幸本文緒論提到的〈知乎〉一文節錄了部分文獻，可供參考。據之，1942年夏天，國民政府陝西省當局發現中共在邊區大量採收鴉片，立即專函毛澤東要求根據國民黨中央法令，厲行禁令，因此引發中共當局和報紙的徹底否認和全面駁斥，反而指控國民黨區仍然種植和販賣鴉片。儘管如此，中共中央迫於現實需要，仍需以鴉片來賺取法幣外匯，故一面下令陝北停止種植，另一面則要晉綏根據地填補空檔，為陝北提供輸出所需的鴉片^㉓。

蘇聯情報人員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的相關記載非常有意思。此書如岳謙厚所說，確有為中蘇分裂後政治服務的嫌疑，但書中提到鴉片種植和販賣的一則記載，絲毫看不出有此意味，反倒可以用來佐證岳謙厚的論點^㉔。

1942年8月2日，毛澤東邀約蘇聯的電報機要人員尤任(Igor V. Yuzhin)到窯洞裏打麻將，在牌桌上尤任忽然問道：陝北農民都不允許種鴉片，為何最近軍隊和機關公開生產鴉片？毛澤東尷尬未答。候補政治局委員的前任中央黨校校長鄧發是工人階級出身，快人快語，連想都沒想，立即回應道：邊區輸出食鹽賺不了幾文，不如鴉片可以換回大量法幣，可以買武器打國民黨^⑦。尤任負責收聽美日和重慶的新聞廣播，應該聽到國民黨和日方關於鴉片的廣播。8月是鴉片收穫季節，正要開始加工。8月14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政務會議後，南漢宸便親自向林伯渠報告特貨買收問題^⑧。尤任是小人物，尚且發現了延安種植和生產鴉片的情形，他的上司弗拉基米洛夫是專職情報人員，當然更清楚狀況。無論如何，尤任的無心之問，很難令人不去聯想毛澤東會有甚麼反應：會不會因為他的發問而再次想到國民黨方面的嚴重指控，以及其他方面的新聞議論，所以下令轉移鴉片種植地點？

1943年初，中共以統一陝甘寧和晉綏的財經領導為名，成立西北財經辦事處，直接由高崗的西北局領導，同時要晉綏120師師長賀龍兼任財經處主任，負責落實新政策：一方面貫徹鴉片統購統銷，另一方面則在陝北嚴禁吸食和販賣鴉片。財經處轄下的陝北禁煙局和土產公司是兩塊招牌、一個班子，負責執行相關政策。根據此一政策，過去有些軍隊和機關單位包運鴉片的行為成為嚴禁對象，所以1943年5月中旬，當359旅副旅長蘇進發現衛生部的領導包運特貨，便要求執行紀律^⑨。其實，直到同年10月，毛澤東還是發現有些軍隊和機關單位仍然在暗中從事鴉片販賣，所以在延安的整風審幹告一段落之際，以黨史路線鬥爭學習為由，逼迫王明、周恩來、秦邦憲和張聞天相繼認錯屈服後，他在西北局第二次高幹會議（一次以軍事幹部為主要對象的會議）上公開指出^⑩：

關於統一貿易，有兩個問題，一是食鹽稅。一是鴉片專賣，鴉片問題在邊區黨內外，有許多人不知道，全年支出60萬萬元，財政廳只支出18萬萬元，六萬萬元，如果不搞鴉片怎麼辦？邊區地廣人稀是好處，但地廣人稀又是壞處，這樣大的開支，沒有鴉片煙怎麼辦？所以鴉片煙要專賣，不准分散搞了，要在三個月內搞到一萬萬五千萬法幣消滅黑市，這一條要執行。

這段資料明顯有文字錯誤，標點尤其帶有隨意性，更有語意不明和交代不清之處，譬如60萬萬元是否以邊幣為單位？財政廳用為支出的經費是否包括毛澤東所說「明修棧道」的軍民大生產運動所得？中共官方資料強調大生產運動的財政貢獻，到底這個大生產運動在解決延安中央的財政問題上，如何與「暗渡陳倉」的鴉片種植和輸出比較？我們掌握的中共資料顯示：從1941到1945年為止，後者解決了延安中央財政需要二成五到五成左右，是不是官方的嚴重低估？儘管有以上疑問，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就是毛澤東認為「暗渡陳倉」的鴉片輸出比「明修棧道」的大生產運動重要多了，所以在這段話中連大生產運動都沒提及。另外可以確定的是，毛澤東認為鴉片收入重要，因此決不容許各軍隊和機關單位介入鴉片貿易，他要貫徹中共中央統購統銷鴉片的政

策，尤其不容許民間走私商人賺太多利潤。毛澤東這裏也沒說明，他已開始整合中共陝甘寧晉綏五省兩地的鴉片事業，實行分工合作，晉綏敵後根據地負責種植和生產，陝甘寧邊區負責以國民黨區為主的境外貿易。

牛蔭冠是負責鴉片統購統銷的晉西北貿易局長兼銀行行長，他在改革開放時期回憶說，1943年初，王震攜帶毛澤東的親筆信到晉綏根據地首府興縣，要當地黨政領導大搞鴉片貿易，理由是鴉片可以賣到國民黨區，換回黃金，再以之到日本佔領的太原購買棉布，以解決晉綏和陝北軍民的穿衣問題。牛蔭冠跟朱理治一樣，都是在清華大學做學生的時候參加共產黨，不過兩人相差十二歲，黨齡也相差約十年。朱理治出身江蘇南通中醫世家，牛蔭冠的家世更好，他的父親牛友蘭是晚清京師大學堂（後來的北京大學）的學生，乃晉西北首富兼大地主，大部分家產都捐給了中共。1947年晉綏土地革命時，牛友蘭卻成為農民鬥爭的對象，被鐵錘敲打以後，鼻子穿上鐵絲，接上麻繩，遊街示眾。牛蔭冠被迫公開宣布斷絕父子關係，負責執行。牛友蘭在遊街示眾之次日，齎恨以終^②。牛蔭冠在回憶這個「不得已而為之」的「大義滅親」之舉同時，也透露了他在晉綏貿易局長任內，為開拓鴉片販賣而鞠躬盡瘁。1945年上半年，他還特別到延安向當時負責中共中央財經工作的政治局委員陳雲報告。陳雲重覆毛澤東的指示說，一定要搞好晉綏的鴉片貿易。8月日本投降後，陳雲趕赴東北，出任東北局委員，臨行前還特別打電報給牛蔭冠，再三提醒他做好鴉片貿易的工作^③。

陝北自產和晉綏輸入的鴉片如何輸出？王震的359旅早在1937年就開辦了合作社，後來改名為大光商店，1941年初從綏德進駐南泥灣時，擴大營業，原來只有9萬元法幣資金，南漢宸的財政廳增資31萬元，除本店外，又設立十個分店。一年下來，盈利近300萬元邊幣，除約100萬元自用外，其餘全部上繳黨庫。第二年盈利加倍，達到672萬元邊幣，上繳近500萬元^④。當然，賬面有這麼多的盈利，未必表示大光商店做鴉片買賣，但是我懷疑其中有不少為鴉片輸入所得。二十八年前，拙作根據當時可以掌握的資料研究，便懷疑大光商店在1941年以後也介入鴉片買賣，並指出其鴉片主要來自沒收和寄賣，原產地可能是日本佔領區的山西和綏遠兩省。至於陝北鴉片，則主要來自鄜縣和延川兩地民間偷種，與中共中央的財經決策並無關係^⑤。1941年以後，中共在打破國民黨經濟封鎖的考慮下，才在南泥灣一帶自種。

隴東的材料可據以說明中共如何做鴉片買賣。1941年，許多黨政單位開店：隴東地委開德豐源，隴東專署開慶豐源，專署財政科開新義商店，軍隊辦軍人合作社，慶城和曲子縣委開光華商店^⑥；不知道這些商店有無介入鴉片買賣。1942年，邊區政府針對食鹽和鴉片的大量生產分別設立鹽業和土產等公司，後來合併由邊區銀行的物資局或貿易局管理，開始對食鹽和鴉片進行統購統銷。梁愛民在禁煙督察處擔任官員，同時負責販賣鴉片，他到慶陽赴任時，取得駐軍358旅合作，由旅長王維舟和政委甘渭漢派兵護送鴉片。梁愛民最初把煙土放在隴東地委（書記馬文瑞）開的救亡商店，由商店找國民黨區的商人運往境外，換回金銀法幣和所需物資。後來他自己在慶陽開店，並在西華池、驛馬關以及其他五個邊境地方開設分店^⑦，招募國民黨區的商人前來走私，由他們將鴉片放在鹽包、馬鞍和酒罈中運出；這些商人有時自備

武裝護送。至於走私商人如何賄買國民黨政府官員，梁愛民不聞不問，只要能把鴉片運到國民黨控制的西峰鎮一帶換回所需物資，其他事情就不管了。據當事人後來回憶，梁愛民經營的土產公司隴東分公司於1942年開業以後，生意迅速擴大，有工作人員一百多位，每月推銷特貨一萬兩左右。當時一兩鴉片可賣30多萬元（單位不詳），可換回一匹藍市布；十幾兩鴉片更可換回一兩黃金。以黃金計算，一萬兩鴉片應可賣到千兩黃金，其利潤驚人^⑦。

據洪振快〈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的資料，1944年鴉片外輸地區中，隴東不如關中，隴東佔26.9%，關中佔31.86%。由於南泥灣本來就是中共邊區的南大門，東南與晉軍閻錫山戰區司令部的秋林鎮毗鄰，但越過黃龍山，則可沿洛河南下，進入國民黨關中地區；關中地區盛產陝北所需要的棉花和棉布。因此，我過去懷疑359旅的大光商店在鴉片的運送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岳謙厚的史料則證實了此一懷疑不謬^⑧。我也認為中共的鴉片主要市場是國民黨統治區，理由很簡單：日本在其佔領區鼓勵和命令農民種植鴉片，並不缺乏貨源。

在暗渡陳倉走私鴉片的同時，毛澤東鼓勵明修棧道，動員陝北軍民進行大生產運動。359旅除了種植鴉片以外，也大量種植糧食和飼養牲畜，增加糧食和經費的自給率，但是要到1943年才有萬石餘糧可以上繳^⑨。他們開墾山林，改土改水，南泥灣呈現江南水田風光，因此獲得「塞北江南」美譽。1944年4月下旬，弗拉基米洛夫發現，王震的359旅和文年生的警一旅分別派人剷除鴉片田，原因是不久就會有一個中外記者團前來延安訪問。弗拉基米洛夫擔心鴉片田到處都是，若被記者發現，後果不堪設想^⑩。如果他知道鴉片種植已經在1943年大規模移往晉綏，則不必煩惱杞憂，王震旅長很容易就掩滅了實物證據。1944年6月到9月中外記者團進入陝北之前，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祝紹周路過西安，指責中共軍隊在陝北種植鴉片，此舉無異於事先警告延安當局，調查鴉片種植是記者團中國民黨成員的重要關懷。他們抵達南泥灣後，到處尋找種植鴉片的證據，皆無功而返。六位外籍記者根本不相信中共種植鴉片，其中富爾曼(Harrison Forman)和斯坦因(Gunther Stein)天天圍繞在王震身邊，另外四位記者也都強調沒有看到鮮豔的罌粟花。富爾曼和愛潑斯坦(Isarel Epstein)特別強調，他們在邊區自由行走，從沒看到鴉片的蹤影^⑪。隨後而來的美軍「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包括成員謝偉思(John S. Service)，似乎對這些記者的結論也深信不疑：謝偉思在向美國國務院報告延安的經濟生活時，只是盛讚中共領導的大生產運動，以及軍隊的自力更生、解決吃穿等生活需要^⑫。為何如此，以前始終不得其解；現在知道中共從1943年以後開始停止在陝北種植鴉片，就一點也不奇怪了。正由於此一政策的執行，連情報工作不行的國民黨也發現，1943年以後陝北販賣的鴉片中有百分之六十來自晉綏邊區^⑬。總之，陝北自種的鴉片明顯減少，但是晉綏供應的鴉片有增無減，陝北的走私販賣更始終沒有停止過。

中外記者團來訪後不久，359旅大部分軍隊南下河南和湖南，關於這支軍隊擁有黃白黑「小家底」的傳言始終不斷。所謂「小家底」指旅部的私房錢，其中黃指黃金，白指白銀，黑則指大煙土。1948年10月遼瀋戰役前，林彪第四野戰軍成立第十縱隊，司令梁興初就坦白指出，有人說其主力部隊第二十八

師前身為359旅之一部，有「小家底」，故不能打仗。他要二十八師將它們立即全部交出，另以實際作戰表現來澄清傳言^⑭。可惜，他沒有澄清所謂「小家底」是否來自延安南泥灣。

梁愛民身兼禁煙督察處和土產公司幹部，一方面逮捕民間私種和私賣鴉片的人犯，另一方面則販賣沒收和官方栽種的鴉片，以所得利潤支持所謂革命活動。這種變相的鴉片貿易壟斷，其實是陝甘寧和晉綏兩個根據地的共同情況；其他根據地似乎有點不同，但有了販賣沒收鴉片的經驗以後，有的黨組織和軍隊也同樣以鴉片籌集活動經費。1944年7月，張劍石以河南伊洛區工委書記身份前往該地區發展黨組織，129師的旅級將領皮定均就要軍需處提供300兩鴉片作為工作基金。曾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李銳及其原來夫人范元甄是中共從延安派往東北的新聞幹部，在從熱河到遼西途中，都領有鴉片作為盤纏或緊急之用。范元甄發現有些幹部的家屬攜帶的鴉片竟然多達百兩^⑮。我們不知道這些鴉片從何而來、他們這樣做是部隊或機關單位的常態還是偶然，不過其中顯然有貪污腐化問題存在。1950年3月，中共宣布建國後約半年，山西萬泉有一位幹部寫信給毛澤東說，過去中共買大煙料子，往敵區銷售，現在沒有敵區（國民黨區或日偽佔領區），卻同樣販賣，太原和西安都有公家的貿易公司販賣，而且據說都有保票，公安局不敢沒收^⑯。由於此時日偽和國民政府都已不存在於華北地區，這些公家販賣的鴉片，應是中共根據地的自產。不知道毛澤東將這封信轉給華北局以後，除刊登於該局出版的《材料匯集》外，更採取何種措施？

五 結論：別讓「暗渡陳倉」從歷史敘述中消失

中共在抗戰前夕，就致力於國共統一戰線的建立，為此不惜自我矮化，把紅軍變成國軍名義上的一部分，並把中共政府變成國民政府名義上的下級單位。但是毛澤東從一開始便強調其軍隊和政權的獨立自主性，尤其強調其軍隊進入日本侵略軍無法有效佔領的廣大日軍敵後地區，動員農民，建立政權，汲取資源，擴大武力。儘管中共堅稱，這些作為都是為了壯大抗日力量，實際上卻對國民黨政權形成巨大的挑戰和挑釁，因為中共每建立一個敵後根據地，就代表國民政府喪失一塊地區的法理或實質控制。因此，儘管兩黨都強調抵抗日本侵略，必須共赴國難，彼此之間卻不可避免地發生矛盾和衝突，而且愈演愈烈。毛澤東確曾反覆強調，在抗日大敵和民族矛盾之前，國共兩黨必須團結合作，但從來不認為為了團結合作，中共就必須放棄對國民黨的鬥爭，尤其放棄在日軍敵後的發展和壯大。國民政府也一樣，雖然堅信抗日到底，但是對中共在敵後的發展不可能無限期容忍，當國民黨發現在兩黨對敵後地區的爭奪戰中已經屈居下風，又不可能放棄抗戰，對日妥協，集中全力來與中共進行武裝爭奪時，就企圖在同為大後方的中共西北地區進行攻擊，只不過採取的方式不是軍事進攻，而是經濟戰，以徹底斷絕軍政撥款和實施經濟封鎖來脅迫中共中央屈服。中共因此陷入軍隊和幹部沒吃沒穿的嚴重財經危機當中，種植和販賣鴉片便成為中共反制國民黨攻勢的策略。

西方著名左派學者賽爾登 (Mark Selden) 研究 1940 年代的陝甘寧邊區時，強調中共能夠渡過財經危機，甚至後來在國共競爭中贏取最後勝利，都是因為它懂得人民群眾的力量，反對官僚主義，實行呼應人民群眾需要和期望的財經政策。他強調毛澤東掀起大生產運動，動員全黨幹部和軍隊生產，動員邊區農民開地、養豬和運鹽，這些做法都是中共贏得農民擁護的重要原因^⑩。但是證據顯示：毛澤東的群眾動員做法 (包括減租減息、成立和推廣生產互助組織、精兵簡政)，對中共打破 1940 年代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雖有貢獻，但都是明修棧道，毛澤東真正賴以渡過財政難關的乃是暗渡陳倉，亦即大量種植和走私鴉片，並用以換回陝北急需物資。不過，毛澤東並未因而廢止或放寬了中共境內嚴禁吸食和販賣鴉片的政策。賽氏如果知道毛澤東以鄰為壑，販賣鴉片到國民黨區，以徹底解決貿易逆差問題，應不至於硬拗之為所謂群眾路線的具體表現吧。

中國大陸的歷史學者洪振快和岳謙厚，以及幾位匿名的網站作者，證明了二十八年前的拙作的基本論點，亦即中共在 1940 年代初期在陝北種植和販賣鴉片，不僅依賴鴉片利潤渡過財政難關，而且據以訓練和壯大其革命幹部隊伍。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文獻證據，也在我注意不到的議題上有許多新的發現和創見。我在這裏則要指出，1945 年國共內戰重新爆發以後，中共中央應該不再直接介入種植和販賣鴉片的決策，但習慣於抗戰時期的陝北經驗，仍有許多軍隊和機關單位繼續暗中從事這種買賣，這種「大公」不能控制的「小公」鴉片買賣很容易變成幹部貪污腐化的溫牀。中共要等待國共內戰勝利、建立新政府以後，才完全禁絕種植和販賣鴉片。

毛澤東在 1941 年以前尚未直接介入陝北邊區的財經決策，但早在 1940 年，已因為國民黨政府控制和財經撥款援助逐漸減少，甚至有隨時中斷之虞，而開始鼓吹部隊和政府各機關單位自力更生，鼓勵他們從事各種生產，自籌生活經費。這些單位因為農業生產獲利緩慢，開始涉足商業，恐怕也有人涉足鴉片走私。到 1941 年新四軍事件爆發後，中共遭遇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國民黨不僅不繼續提供經費，還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全面封鎖；加上敵後根據地和蘇聯盟友在各自敵人的攻擊下都自顧不暇，中共只好擴大對農業部門的糧食徵收，負擔之重曾導致延安外來移民大量逃離邊區，以及農民對毛澤東作出詛咒。毛澤東因此更加重視軍隊、學校和機關單位的生產，也愈發提高他們自籌經費的比例。在毛澤東的財政高指標壓力下，軍隊似乎最早求助於鴉片販賣和種植，朱德和任弼時恐怕是最早縱容和鼓勵種植與走私鴉片的邊區領導人，南漢宸尤其以買賣鴉片為渡過財經難關的不二法門，主張大量種植和販賣，因而招致林伯渠、謝覺哉和高崗的強烈反對^⑪，兩派人馬爭論不休。在此情形下，毛澤東不得不親自介入，明確支持大量種植和販賣鴉片的決策。他一方面透過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擴大邊幣發行，大量投資鴉片栽種和走私；另一方面透過朱德和任弼時擴大軍隊的大生產運動，同時也透過欽點的財政廳長南漢宸去說服一般幹部，以致連以魯迅大弟子自居的非黨幹部作家蕭軍在 1942 年聽取報告後，也以為革命的花朵非在卑污的糞壤中生長不可，因而在日記裏投下了無可奈何的贊成票。

謝覺哉盛讚毛澤東自我批評，指出下令栽種製造和販賣鴉片是他一生不得已而為之的兩大錯誤之一，更強調毛澤東的坦承不諱是其仁政觀點的表現，不像一些沒有仁政觀點的高幹，利字當頭，積極從事鴉片內銷，把鴉片賣給陝北當地農民^②。作此評論時，謝覺哉忘記「仁政觀點」這個觀念，正是毛澤東加諸林伯渠身上的一個「罪名」，並逼迫他在1941年底政治局會議上不得不以此自我批評，批評自己受到仁政觀點擺布，總是反對強迫動員農民運鹽；謝覺哉也忘記他所謂的「仁政觀點」，更是毛澤東和南漢宸批評林伯渠與其他兩個人反對鴉片貿易時所使用的語言。謝覺哉用仁政觀點說明毛澤東承認兩次不得已而為之的錯誤，根本是混淆傳統儒家仁政和毛澤東革命。儒家仁政強調仁民愛物，主張輕徭薄賦，是不帶階級鬥爭含義的；毛澤東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迷信社會上階級鬥爭無所不在的進化史觀，想將中國推向新的社會發展階段。毛澤東因而強調，如果真要追求所謂仁政，則他的仁政以共產革命為終極目標，是大仁政、真仁政；至於儒家的仁政，則因為不追求社會進化，所以不過是小仁政、假仁政而已。總而言之，毛澤東用以說服自己犯下不得已而為之的錯誤時，服膺的並非孔孟所說的當下的超階級仁政，而是他自己相信的未來中國革命。他所謂的未來中國革命，就是在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戰後，繼續厚積實力，再轉守為攻，打倒國民政府，奪取中國政權，俾實現他根據馬列主義為中國設想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次革命。對毛澤東而言，這種馬列主義的大仁政與儒家小仁政根本是兩碼事，不容混淆。

在後毛澤東時代，卑污糞壤中盛開過的革命花朵，證明並不能維持其所期望的燦爛，反而一度把中國帶入發展困境。因此鄧小平告別毛澤東革命，走向市場經濟的時代。若毛澤東地下有知，不知是否會再以革命理想來為自己不得已而為之的決定辯護？儘管有此疑問，我們不能以中共曾經種植和販賣鴉片來否定毛澤東一代人為追逐馬列主義革命理想而鞠躬盡瘁，但是歷史畢竟是講真話、說真事的志業，既然毛澤東不斷說中共是光明磊落的政黨，決不刻意掩飾自己的錯誤，也強調種植和販賣鴉片是為了革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正確政策，為甚麼這一頁歷史卻被中國官方全力掩蓋了五六十年，迄今仍不能老老實實面對並承認？為甚麼不能允許其學者據史直書並盡情討論？掩蓋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於陝北大量栽種和販賣鴉片的歷史，只會讓我們錯誤地高估其依靠農業自力更生政策的成效。

註釋

① 岳謙厚：〈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特貨貿易〉，《Rur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13, issue 2 (2016): 173-206。中國大陸版《中國鄉村研究》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內容與海外版（電子版）基本相同，但篇數有所刪削。關於中共在晉西北忻州地區的鴉片種植和販賣，可參見〈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挽救了中共政權〉（2013年8月4日），博訊新聞網，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3/08/201308042359.shtml。

②③④ 陳永發：〈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新史學》，第1卷第4期（1990年12月），頁41-117；80-81；82。

- ③ 參見馬模貞主編：《中國禁毒史資料：1729年—1949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頁1615-18，附錄，陝甘寧邊區查獲鴉片毒品暫行辦法第四條和第八條。
- ④ 梁愛民：〈永遠難忘的革命歲月〉，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延川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延川文史資料》，第三輯（內部資料，1988），頁99。梁愛民是延川禹居人，出身沒落商家，中學畢業後擔任小學教師。1929年入黨。1941年11月在財政廳禁煙督察處工作。梁愛民的回憶可從慶陽地委黨史辦：〈隴東貿易的發展及其活動〉，載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隴東革命史料選輯》，第一輯（內部資料，1985），頁341-48得到進一步證實。
- ⑤ 陳永發：〈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頁64；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陝西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頁17、59、426-27。「歲入」和「財政開支」兩詞出自中共檔案，但都沒有仔細定義，並未說明其中是否包括公糧公草收入。
- ⑥ 洪振快：〈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炎黃春秋》，2013年第8期，頁49-58。
- ⑦ 〈知乎：共產黨真的在南泥灣種過罌粟嗎？〉（2014年3月4日），牆外樓網，www.letscorp.net/archives/65083。
- ⑧ 岳謙厚：〈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特貨貿易〉，頁174，註釋2。
- ⑨ 不久之後，1936年春，中共即派軍渡過黃河，攻打東邊山西的閻錫山，其目的即在取得大量糧食和金銀貨幣，以解決後勤困難。
- ⑩ 陝甘寧邊區政府此時到底轄有多少縣，又有多少人口，很難確言。中共官方文件說，邊區有十八或二十二個縣，一百萬人。據陝北老幹部馬明方說，實際佔有二十九個縣，但可分為三類：一類佔有全境，包括縣城（保安、安塞）；一類佔有縣城以外全境，縣城為國民黨佔有，設有縣長（延安、延川、延長、甘泉、靖邊）；另一類則國共分別佔有部分縣境，共二十二個縣，有的共產黨佔優勢，有的國民黨佔優勢，綏德和榆林屬於後者。毛澤民說，僅三十萬到四十萬人納糧；周恩來向共產國際的報告則說，中共轄區人口僅568,675人。以上資料分別取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5）》，第十八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頁167、93-95、230、316。
- ⑪ Stephen Kotkin, *Stalin: Waiting for Hitler, 1928-1941* (Britain: Allen Lane, 2017), 458。莫斯科在1937年8月21日與國民政府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接着在同年9月14日簽訂附件，蘇聯同意提供5,000萬美元貸款購買軍火，但國民政府同意將購買軍火經費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交由中共軍隊使用。
- ⑫ 黃正林：《陝甘寧邊區社會經濟史（1937-194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192-201；鄧加榮：《開國第一任央行行長：南漢宸》（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頁171-72；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上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頁401。黃正林的著作翔實，數據主要來自中共出版的財經史料摘編。
- ⑬ 據鄧加榮所說，1937年底中共渡過黃河到1938年底國民黨從武漢撤退以前，八路軍需要45,000套軍服，包括軍衣軍帽、皮帶膠鞋、綁腿挎包和軍用毛毯，均從武漢運來。1939年開年以後，國民政府改發經費，由中共自行設立軍服廠，與七家私營工廠合作生產。1941年底開始，中共沒有國民政府的資助，只好由軍隊自行設法解決所需被服問題。參見鄧加榮：《開國第一任央行行長》，頁187-88。
- ⑭ Stephen Kotkin, *Stalin*, 744, 1042, n. 215。周恩來的財政收入數字，容有疑議。首先，他所謂華北根據地不知道是否包括陝甘寧邊區在內。其次，他說1940年中共只從國民政府取得11萬美元，前一年法幣已從每100元法幣換30美元跌至換16美元（採取浮動價格），到1940年則跌至換20美元（此時採取強制官方匯價，當然黑市價格要高很多）。按照周恩來的報告，我們仍無法知道中共到底從國民政府取得62萬元法幣還是220萬元法幣。惟據林彪1939年2月向共產國際的報告，國民政府每月撥款60萬元法幣（參見Ivo Banac ed.,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1933-1949*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95-96），周恩來說的應該是62萬元法幣。再者，周恩來說的黨費收入也有疑點。他說中共有黨員五十萬，月入黨費4萬美元，平均每一個黨員每月繳8角美元，合共法幣4到0.032元之間。如果他計算時用的是法幣貶值前的價格，這個數字合理，但是大多數的黨員都是中共支付津貼，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 ⑮ 參見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295-96。
- ⑯ 《徐向前傳》編寫組：《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232-33。
- ⑰ 李亦然：〈七大——走向勝利的豐碑〉，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大代表憶七大》，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189-91。
- ⑱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5）》，第十八卷，頁5-6。蘇俄提供給國民政府的軍事貸款總數為4.5億美元，其中1938到1939年提供2.5億美元；附帶條件是其中一部分應供給中共使用。
- ⑲ Stephen Kotkin, *Stalin*, 1004, n. 209;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1933-1949*, 67-69。
- ⑳ Stephen Kotkin, *Stalin*, 744, 1042, n. 215。
- ㉑ Alexander Pantsov,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334。
- ㉒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5）》，第十九卷，頁185、197、227、250、253。
- ㉓㉔㉕㉖ 參見鄧加榮：《開國第一任央行行長》，頁21-22；15-19；24-28、376；15-19。
- ㉗ 張希坡：《革命根據地法制史研究與「史源學」舉隅》（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335-39。關於雷擊事件，中共高幹中的習仲勳和王丕年都說是發生在1942年8月，但張希坡根據《謝覺哉日記》證明是1941年6月。張希坡沒有解釋他們記憶發生錯誤的原因，我的揣測是，他們都想以1943年公糧的減徵證明毛澤東聆聽農民聲音。其實毛澤東只是不追究詛咒他的農民而已，他仍然聽從南漢宸加徵公糧的建議，認為從抗戰以來，中農以下的農民根本不繳公糧，所以大部分農家都有餘糧，可以放膽借徵。鄧加榮說幹部工作團只借了1.6萬石公糧，其實不確。至於他說，南漢宸批評林伯渠的公糧政策是仁政思想，所以輕徭薄賦。這是1941年底毛澤東對林伯渠的指責，不知道鄧加榮所說是否確實。參見鄧加榮：《開國第一任央行行長》，頁21-30。
- ㉘ 中國財政科學院主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6），頁92-93；鄧加榮：《開國第一任央行行長》，頁166-74；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上卷，頁40。鄧加榮這一段敘述好像是講1942年，但開頭一段中的「上半年」顯示，1941年的20萬石糧基本就是根據這裏所說的新稅法徵收的。
- ㉙㉚ 〈朱理治回憶錄 往事回憶〉，載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紀念朱理治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469；466-67。此書有兩個版本，以下如無特別註明，均指2007年版。另參張文杰、王懷安、郭曉平主編：《紀念朱理治文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 ㉛ 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陝西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五編，金融（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頁152。
- ㉜ 〈朱理治回憶錄 往事回憶〉，頁465-68；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325。
- ㉝㉞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下冊，頁734；733。
- ㉟ 鄧加榮、韓小蕙：《南漢宸傳》（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頁254-58；鄧加榮：《開國第一任央行行長》。一位北京清華大學出身的朋友知道我撰寫一篇關於延安鴉片的文章後告訴我，南漢宸在1949年出任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後，拜訪中國最有名的翻譯家楊憲益時，曾非常洋洋自得地說，延安種植和走私鴉片，是他首發其議。
- ㊱ 鄧加榮、韓小蕙：《南漢宸傳》，頁254-55。抗戰爆發，中共中央渡過當時的軍事和經濟難關以後，便要陝甘寧邊區政府根據國民政府法令，制訂禁煙禁毒的法令。這個法令現存的只有草案，也不知道當時如何執行，僅知至少已開始調查煙民，林、謝、高三人的反對信說明，此一草案並非官樣文章，曾經得到大力執行。參見〈陝甘寧邊區禁煙禁毒條例（草案）〉，載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第一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頁470-72；齊霽：〈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的禁煙禁毒鬥爭及其歷史啟示〉，載中共中央黨

- 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6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頁505-506；張瑞、于耀洲：〈延安時期中共在陝北地區禁煙運動述論〉，《黨史文苑》，2016年第22期，頁21-24。
- ③⑦③④④ 鄧加榮、韓小蕙：《南漢宸傳》，頁254-55；252-53；256；256；257。
- ③⑧ 鄧加榮：《開國第一任央行行長》，頁45-50；鄧加榮、韓小蕙：《南漢宸傳》，頁252-53。
- ④② 陳興旺主編：《定邊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頁425-26。1940年，中共已動員八路軍120師359旅和駐定邊的部隊警三旅動手打鹽，這一年定邊全縣產鹽40萬馱。
- ④③ 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陝西省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三編，工業交通（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頁746-51；毛澤東：〈《魯忠才長征記》一文按語〉，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頁82。
- ④④④⑤⑤ 黃正林：《陝甘寧邊區社會經濟史（1937-1945）》，頁426-27；244；492-94。
- ④⑤ 章學新：〈推動延安整風的關鍵性會議——真誠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誘過、倒算〉，《黨的文獻》，1997年第6期，頁67-68；張素華主編：《毛澤東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150-51。
- ④⑥ 《定邊縣志》，頁426-27。
- ④⑦④⑧ 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上卷，頁399；457。
- ④⑩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上冊，頁316。
- ④⑪ 〈朱理治回憶錄 往事回憶〉，頁468。朱理治說是商人代表團，謝覺哉說是士紳代表團，應該都對，因為這些代表兼具士紳和商人兩種身份。
- ④⑫ 〈朱理治回憶錄 往事回憶〉（1993），頁584。
- ④⑬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三卷，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45。
- ④⑭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1981），頁426-27。
- ④⑮ 齊霽：〈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的禁毒鬥爭及其歷史啟示〉，頁504。法幣和邊幣都在貶值過程中，此時邊幣貶值更快，1941年1元邊幣可換1元法幣，此時要3元邊幣才能換取1元法幣。參見李實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貨幣史》（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頁94-95。
- ④⑯ 到底有多少，很難弄清楚。參見〈知乎：共產黨真的在南泥灣種過罌粟嗎？〉；史志誠主編：《陝甘寧邊區禁毒史料》（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137文件。
- ④⑰ 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下卷，頁339、344、346。
- ④⑱ 西北局辦公廳邊區研究室：〈南泥灣調查〉（1943年2月），載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3年（一）》（內部資料，1994），頁268-69。文件上寫的「八團」，就是718團。該團在1940年春從晉綏進入陝北綏德，趕走國民黨綏德縣長何紹南，不久便在綏德開始參加生產運動，當時主要活動似乎是經商。王恩茂的回憶有點不同，他是359旅副政委，主持生產工作，他說全旅分三批進入南泥灣，最早是在1941年3月，最晚是在1942年8月，所以各團駐地不同，特務團（團長徐國賢，政委譚文邦）駐金盆灣，717團（團長陳外歐，政委李銓）駐臨真鎮，718團（團長陳宗堯，政委左齊）駐馬坊，719團（團長張仲瀚，政委曾滌）駐九龍泉，補充團（團長蘇鰲，政委龍炳初）駐南泥灣。參見王恩茂：〈憶南泥灣大生產〉，載曲青山、高永中主編：《抗日戰爭回憶錄》，第二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頁105-109。這裏的單位是華里，若無錯誤，則有地100萬畝應為誇張說法。
- ④⑲④⑳ 西北局辦公廳邊區研究室：〈南泥灣調查〉，頁269；270-72。
- ④㉑ 伍海鷗：〈陝甘寧邊區審計工作片斷回憶〉，載中國審計學會、審計署審計科研所編：《中國革命根據地審計史料彙編》（北京：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0），

頁447。當時開墾，中央各機關採取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自營，一種是夥種。所謂夥種，指招農民為夥伴種地，收穫食糧，公二私八分配。參見星光、張楊主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稿》（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8），頁172。

⑤③ 中共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8-9；張仲葛：〈樂天宇——開墾南泥灣的人〉，載張仲葛、徐旺生編：《張仲葛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頁531-32。

⑤④ 1940年2月6日，高崗到綏德傳達中共中央「邊區化警備區」的決定，隨後359旅即發動綏德民眾反對國民黨專員何紹南的運動。旅宣傳隊宣稱何紹南貪污枉法，其主要罪狀即為販運鴉片，359旅的人還打死了一個正在吃鴉片的國民黨副官。1990年代馬玉書在其359旅史中說，359旅發動宣傳戰，揭發國民黨運輸代辦所以何紹南護照在宋家川走私鴉片，令何紹南狼狽不堪。參見王恩茂：《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82、86-87、93-97；馬玉書：《359旅光輝戰鬥歷程》（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頁12-13。

⑤⑤ 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陝西省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四編，商業貿易（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頁351；《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八編，生產自給（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頁181-84。這一史料原見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為其中「三五九旅三年以來在生產建設方面的總結」一節的摘錄，裏面有「土產」和「大光肥皂」等詞彙，令人懷疑所指的是鴉片。星光、張楊也說，1941年大光商店經營的大部分商品都是從晉西北來的。參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稿》，頁229。

⑤⑥ 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口述歷史·延安的紅色歲月」項目組編：《南泥灣》（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2），頁16、278。

⑤⑦ 中共延安市委組織部、中共延安市委黨史研究室、延安市檔案局：《中國共產黨陝西省延安市組織史資料（1920.7-1987.10）》（內部資料，1995），頁132；〈陝甘寧邊區政府訓令——令接手管轄濫泥注松樹林一帶地區〉，載陝西省檔案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編：《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頁27-28。此時官方文件中，爛泥窪作「濫泥注」。

⑤⑧ 中共北京農業大學委員會黨史徵集小組：《中國共產黨北京農業大學組織史，1921-1957》（內部資料，1990），頁51-52。

⑤⑨ 〈朱德關於部隊生產給陳宗堯等的信〉（1941年6月20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十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頁434-36。

⑥① 藍鴻文：《一道靚麗的風景：老一輩革命家新聞通訊作品選析》（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頁294。

⑥② 西北局辦公廳邊區研究室：〈南泥灣調查〉，頁270-72。此報告未提717團的墾植貢獻。

⑥③ 趙本清口述：〈保衛延安，鞏固邊區〉，載中共上海黨史研究室編：《浦江之畔憶延安》（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頁180-83。

⑥④ 樂天宇、徐偉英、彭爾寧：〈陝甘寧邊區藥用植物志〉，載武衡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科學技術發展史資料》，第五輯（北京：中國學術出版社，1986），頁61-77。

⑥⑤ 岳謙厚強調晉綏根據地的貧窮落後，並無討論1940年晉綏根據地建立以來中共如何介入鴉片種植和販賣。關於晉綏地根據地1940到1949年的鴉片種植和販賣，最有參考價值的官方文獻是1949年5月撰寫的〈晉綏過去九年財政工作概要檢查報告（草稿）〉，載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財政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543-50。在本文殺青後，得見史志誠主編的《陝甘寧邊區禁毒史料》電子版，發現〈知乎〉一文引自該書的證據，僅為一小部分，見該書頁137、284。又1942和1943年重慶

《中央日報》有關鴉片事宜的報導僅有九則(1942年三則,1943年六則),其中兩則是關於陝北邊區種植鴉片的報導,頭一則標題作〈「陝北邊區」種植鴉片,陝省當局密切注意〉,後一則標題作〈喪心病狂一至於此!陝北竟種售鴉片,省府飭屬防範查禁〉,分別載於《中央日報》,1942年5月12日,第3版、1943年5月14日,第2版。這兩則報導顯示,國民黨陝西省政府是中共感到輿論壓力的主要來源。

⑯ Peter Vladimirov,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75), 1; Dieter Heinzig,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1950: 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18-20. 弗拉基米洛夫的英文名字一般作 Peter Vladimirov, 此書作 Petr Vlasov. 弗拉基米洛夫於1942年5月被派往延安,在那裏居住了三年多,於1945年11月返回莫斯科。他的公開身份是塔斯社記者,實際則是共產國際駐中共區聯絡員兼蘇軍情報部情報員。1953年逝世時並未留下任何日記,1973年他兒子奉蘇共書記處之命,根據他和其他同志送往莫斯科的密電和情報,以及本人追憶父親談話編輯成書,內容強調毛澤東在延安時代已有反莫斯科傾向。日記出版前曾受當局檢查,翻譯成各國文字出版後,被中國大陸認為是反華書籍,惡意攻訐侮蔑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

⑰ Peter Vladimirov, *The Vladimirov Diaries*, 43. 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始終堅持境內嚴禁吸食和買賣鴉片的政策,1942年4月中旬,民政廳長劉景範和禁煙督察處長霍維德發通告指出,邊區煙民有死灰復燃現象,他認為山西的日偽政府是萬惡根源,其實主要原因是軍隊為了自力更生,竟然把鴉片買給農民。參見《中國禁毒史資料》,頁1616-18。又據《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彙編》編委會編:《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七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頁3-5,當時邊區政府固然嚴禁鴉片,但是軍隊經常暗中介入鴉片保運、寄賣和走私,子長縣政府的公安局查獲358旅715團保運走私鴉片,從綏德螞蚱峪到子長縣瓦市,並委請兄弟部隊359旅718團販售200多兩。這件司法案件顯示,中共除在陝北指示軍隊自產以外,也從晉綏根據地進口。當時鴉片每兩值145元法幣,走私商人共有39兩,可換得馬一匹,外加騾子兩頭,但鴉片主要還是從關中換來棉花和布匹。軍隊保運費則每兩8元法幣。此外,1942年1月,中央政治局委託前後擔任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時和王稼祥分別到359旅和八路軍留守軍團傳達指示,要求兩支部隊自給自足,以便邊區政府拿出原來給軍隊的一半經費供延安各機關、學校使用。當時傳達的命令是屯墾,但我懷疑他們的指示包括種植和販賣鴉片。參見《彭真年譜》編寫組:《彭真年譜》,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頁206。

⑱ 魏協武主編:《黃亞光文稿和日記摘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103。

⑲ 王恩茂:《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下冊,頁345。亦可參見《陝甘寧邊區禁毒史料》,頁264-67。

⑳ 東北師範大學政治系、中共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四冊,抗日戰爭時期(內部資料,1981),頁121-25。如果毛澤東講的是1943年總決算,則我們無法理解這個決算的說明。根據這個決算說明,全年總收入約為62億元邊幣,政府直接收入佔20%,機關部隊生產佔62%,而銀行借款收入佔18%。至於總支出,則僅有60億元邊幣,政府發放佔36%,機關部隊生產自給佔64%。雖然我們知道「藥材」收入為公營貿易收入的一部分,但無法知道這裏的「藥材」是否為鴉片,更不知道鴉片到底佔了多少百分比。參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1981),頁71-73。

㉑ 牛蔭冠:〈晉西北貿易工作與土地改革〉,載中共呂梁地委黨史研究室編:《呂梁黨史資料》,第八輯(內部資料,1984),頁4、7-11。牛蔭冠指責李井泉、陳伯達、康生為晉綏土改的三大罪魁禍首,但強調毛澤東不知道晉綏土改的過左傾向,後來知道狀況後曾批評李井泉過左。牛蔭冠這一看法顯示,他似乎全不了解土地革命左右擺盪的內在邏輯。

㉒ 牛蔭冠:〈晉西北貿易工作與土地改革〉,頁5。王杰指出,陳雲在西北財經辦事處是實際主持工作的領導人,他曾經為文表示,邊區必須做生意,把東西賣

到國民黨區，黨中央給他任務也就是做生意，但文章中並沒有解釋是做甚麼生意。參見王杰：〈延安時期陳雲轉崗考略〉，載陳雲紀念館編：《上海陳雲研究，2014》（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頁257-95。

- ⑳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七卷，頁3-5。
- ㉑ 慶陽地委黨史辦：〈隴東貿易的發展及其活動〉，頁343-44。
- ㉒ 梁愛民：〈永遠難忘的革命歲月〉，頁101-105。1942年整風時，許多私商被捕，梁愛民出面，以他們繼續走私為條件，將其全部保釋。
- ㉓ 慶陽地委黨史辦：〈隴東貿易的發展及其活動〉，頁341-42、344-46。這一個口述歷史訪問中明確指出「特貨」就是鴉片。
- ㉔ 洪振快：〈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頁52。岳謙厚發現，參與關中分區鴉片走私的單位，除359旅以外，還有358旅、警一旅、警八旅、地委總務科、分區保安處緝私隊、新正運輸合作社、衣食村煤炭公司等（岳謙厚：〈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特貨貿易〉，頁196）。但他沒有告訴我們哪個單位走私鴉片最多。
- ㉕ 王恩茂：〈憶南泥灣大生產〉，頁109-10。
- ㉖ Peter Vladimirov, *The Vladimirov Diaries*, 218.
- ㉗ 愛潑斯坦 (Israel Epstein) 著，沈蘇儒、賈宗誼、錢雨潤譯：《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頁193-96；鄧力群等編著：《王震全傳》（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5），頁117；張文琳：〈全世界人民公正的眼睛——記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中的幾位外國記者〉，載《國際友人西北行記（1935-1949）》（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278-81；張行：《南泥灣之歌》（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2），頁339-42。張行一書為小說，其中有訪問南泥灣359旅老人的口述資料。
- ㉘ David Barrett, *Dixie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 1944* (Berkeley, C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0), 45-46; Joseph W. Esherick, ed.,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183-87.
- ㉙ 王世泰、楊晶晶：《黑山阻擊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2），頁10。
- ㉚ 張劍石：〈伊洛區抗日根據地創建經過〉，載毛德富主編：《百年記憶：河南文史資料大系》，政治卷，卷四（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頁1699；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李銳、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信、日記集》，下冊（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72-81。范元甄以「代金」稱呼鴉片，這個名詞首先出現在1947年4月14日給李銳的書信中。
- ㉛ 王金昌：《潘家園》（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頁220-24。在前一年的1949年11月12日，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長白如冰認為西北已全部「解放」，特貨沒有國民黨區銷路，建議全面加以查禁。參見《陝甘寧邊區禁毒史料》，頁128。
- ㉜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77-278.
- ㉝ 很遺憾，對林伯渠、謝覺哉和高崗反對種植和走私鴉片的書信內容，我們一無所悉。不過，陝甘寧邊區銀行副行長黃亞光在其日記1942年6月8日條記載，謝覺哉認為中國有「和平轉入社會主義的前途」，國共合作可能「永遠」，可能「始終不變」。這是謝覺哉在共產國際解散後提出的見解，但顯然不為毛澤東所接受。從謝覺哉這個見解來看，他可能認為國共關係可以改善，而中共很快可以因為國民黨停止經濟封鎖而改善財經狀況，所以不必再訴諸鴉片策略，以為解決之道。參見《黃亞光文稿和日記摘編》，頁191。
- ㉞ 據《王恩茂日記》1944年3月7日條，359旅旅長王震在財政金融座談會上自我批評，有「〔1943年〕7月賣特貨」和「特貨內銷」等字樣，不知是否指359旅的商業單位仍然在販賣鴉片，並把鴉片賣給陝北農民。參見王恩茂：《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下冊，頁422。